

魯迅正傳

鄒學稼著



勝利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初版

魯迅正傳

每册定價國幣 元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鄭學稼

發行者 印南峯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總經售 文信書局

版權所有

自序

我曾寫了幾本傳記。依出版的次序，第一是「西園寺公望傳」，當牠和讀者會見時，主人公尚是日本的元老，現在已入鬼籍。他應該是喜劇的角色，但我却連面容也沒有畫得像！第二本是「西鄉隆盛傳」。對這位日本「明治維新」的英雄，應該給悲劇的角色，但我的文字的表现却不夠生動！第三本是「加里波的傳」，我應該給這位意大利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者以一個喜劇式的描述，但似乎篇幅限制了我的筆鋒！第四本是「毛澤東評傳」，「先生」兩字是後來出版者加入的，我本想給他以一個喜劇兼悲劇的主角，爲着他是活生生的人，使我在不愉快的限制中，不能盡吐我所欲言。本書是第五本，但由於牠的主人公不列入我所寫的傳記中，所以，抄襲他的作風，給與「正傳」的名稱。他的一生，既未曾演了喜劇，又未曾扮過悲劇，我爲什麼要寫牠呢？只一句話！「正傳」的寫作，本來是沒有大意義的。

當我準備這一工作時，曾加以考慮。世人——尤其是自稱爲「革命」或「前進」的青年們，給與死後魯迅的尊號，是「前進的中國思想家」，是「革命的青年導師」，是「革命的鬥士」，是「革命的文學家」。這些名稱，如不曾嚇倒了若干人，至少是我，却被驚駭了。不錯，我已寫過若干人的傳記，但於所寫的角色，似乎都趕不上人們所魯迅先生。西園寺

公認經過種種軍事部所遺棄的政治家，和某一時期的自由主義的貴族——不僅僅此而已。像這樣的人物，是易於認識的。西鄉隆盛不過是封建時代日本的英雄，加里波的不過是偉大詩人我鑿鞋者。總一句話，不過是我們幼年時所知道的英雄而已。拿破崙是一個英雄，有了若干人爲他寫「本紀」或「傳」我雖不認那些大名士，但我總可說一些英雄的行徑來。毛澤東先生是我們同時代的人，他的一切，我們不會生疏，寫他的歷史，似乎也不難；因爲，至多他不過是一個時勢造成的「一時之雄」。但在那些人物中，有的是「革命者」，是「前進」，却沒有一個真做現在青年所尊稱之魯迅先生。就以馬克思爲例吧，他是一個够前進的革命者兼思想家，但他却未曾寫一篇小說，因此，他不是文學家。那這似乎是說，魯迅先生要比前進的馬克思更前進，要比思想家的馬克思更有思想。像這麼一種的人物，正是我們懼慢之不暇，焉有勇氣去寫他的傳？

上文僥倖道算是表面的想法。就以崇拜孔子爲例，儘管他是一般人心裏偉大中的最偉大者，而崇拜他的人們，也仍然有他的形容詞：「大哉孔子……」。於是，我以常人的孔子比魯迅人，在當時我的下意識裏，有這一決心，若使我不能指示他的偉大，我學日本人贊美他爲「大魯迅」，說一句：「大哉魯迅」就夠了。

我本着這一決心，細心地閱讀「魯迅全集」。讀後，我的勇氣增加了。我的胆子更大了。因爲「全集」不僅爲我指示出，人們的掛維和魯迅的本來價值不相稱，而且帶着若干政治

的目的，而且我居然發現，魯迅先生除了他的文學以外，別的什麼也沒有。如果說他是「革命者」，他却躲在戰陣的後面；如果說他是「思想家」，他的腦子却沒有思想的筋紋。但他究竟是否「青年的導師」，那我不明白，還要問他的受導者。我在同時又發現，這革命家的歷史，並不表示他的「歸還」，只浮現曲線的活動。現在容我由他的歷史說起吧！

我把魯迅的一生分為下列各期：

第一期是他由呱呱墮地起至留日回來任學監止。這時期，他雖然曾加入章太炎的「光復會」但他並沒有具備該會同志徐錫麟的勇氣，只是像他在「阿Q正傳」及「吶喊」中的「假洋鬼子」。

第二期是由辛亥革命到被章士釗革職止的十四年北廷「僉專」。他在這時期，計任學監一個「洪憲皇帝」。只有宣統他是公開反對的，所以，當「復辟」時，他憤然辭職，是否因為他的辦子留在東京，那非外人所知。他的直接長官——教育總長，使我列表統計，共二十七人，在這一大批「總長」中，有的是被魯迅先生罵為「無恥」的章士釗。他之離開教育部，不是由於他們的「大總統」或「執政」的人格有問題，更不是由於「總長」中有否如章士釗的「無恥」，是為着章氏革他的職。依陳西瑩教授在當日「徐志摩」的信中所說，他被革後，憤憤然對人說僉專「並不算區區」。也許為着這「不算區區」之官，所以，當另一個人

——以故宮古物案件而馳名的易培基接長教育部時，他再充當「僉事」。但這時候，周樹人的身和靈却已死亡了。如他在「吶喊」序文中所說的，魯迅却被陳獨秀，疑古玄同們，從「鐵屋」子內喊醒。

第三期是他被喊醒後，張口「吶喊」。這一期，他在文學史上曾留下一段永不能磨滅的記錄。我以「吶喊」中人物，寫成魯迅先生筆下之當時中國農村的景畫。他的「藥」，他的「社戲」，他的「風波」，他的「孔乙己」，是文學中的傑作，但他的把上述各人物大綜合的「阿Q正傳」，却有若干的失敗。這失敗——在文學觀點上——是必然的，可由他的「正傳」的成因」的敘述而得證明。我本來計劃寫一篇「唐，吉訶德與阿Q」，作為附錄，後來為着感覺魯迅比不上西萬提斯，阿Q也不能與「唐，吉訶德」相提並論，遂中止了。但我却對現在不斷提起「阿Q」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者的阿Q言論，給與一個適當的糾正。

第四期是由「吶喊」而「彷徨」，由「彷徨」而坐在「華蓋」之下，因之奔走廈門，廣州與上海之間的魯迅。為着他起來吶喊時，創造社已經在搖旗；又為着他要和她「聯合戰綫」時，創造社却「不准革命」——而且以成仿吾為「元帥」，李初梨為大將，馮乃超為先鋒、浩浩蕩蕩地加以「圍剿」。所以，他不能不一面抵抗，一面準備。準備的結果，是把五十歲的人抬入「唯物史觀」之門。有了牠，他似乎就取得革命的身份證，

第五期是他加入「左聯」，並充當牠的領導者。但他的創作，却變為「什感」。在這時

期，他成爲中共的留聲機，也只有如此而已。可值得注意的，只有那教訓現今在延安廣場上紀念他的周揚和徐懋庸。這次「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爭論，不是有意義的論爭，只是爲爭正統，爲爭取「奴隸總管」的身份而內訌。結果，我們的「青年導師」，却被「惡劣」的青年徐懋庸送往天國去。

把上述五期中主人公的生活及主要作品，給與公平的檢討，是本書的任務。當然，我不是如一般寫抄「魯迅語錄」的「前進青年」，我只是記錄魯迅的生活。魯迅說：「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爲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忽然想到」）我現在寫「魯迅正傳」，也爲着自他被「准革命」起，不過六七年，而魯迅的一切却大大地「失傳」，因此，我寫牠「給少年看」不是給「革命」的青年看。

本來我尙計劃寫魯迅先生的個性等等，但只寫了一半便告結束。我這樣做，是學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的「大團圓」。我在想：我應做的專還多，不能夠爲只配寫一本「正傳」的人，花了更多的時間。也許若干魯迅主義者對牠會引起不平的回答，但這對我並不生什麼反感。我只認爲：我如能做到「凱撒的還凱撒」就夠了。而况我寫牠的目的，本就是教青年怎樣去認識魯迅。

學稼三〇，二，一六寫於井潭草舍

目錄

- 一、假洋鬼子
 - 二、十四年僉事
 - 三、吶喊
 - 四、阿Q正傳
 - 五、不準革命
 - 六、浪子之王
 - 七、革文學的命
 - 八、傳寶
- 附錄：兩個高爾基不愉快的會見

假洋鬼子

本書主人公在蘇聯「文學曆」上，有細下的讚頌：「魯迅非但是一個成功的小說家，並且還是一個出衆的政論家。他把中華民族的全部最新歷史，都反映在他的雜文短論裏。他是爭取中國人民之民族的與社會解放的熱心戰士，他是中華民族反日統一戰綫的熱烈擁護者。魯迅是蘇聯真摯的朋友，他不倦不怠的擁護蘇聯。爲蘇聯辯護，駁斥資產階級與法西斯的謬謗。」看吧！一個小說家，能夠把一個民族的「全部最新歷史，都反映在他的雜文短論」，如果不說是奇蹟，那也值得讚美，而況他實是爲蘇聯從事「不倦」「不怠」的「擁護」與「辯護」的人？然而，這只算是受他擁護與辯護之外國人的觀點。

在中華民族領土湖南生長的手澤東先生，當紀念本書主人公時，以「中國共產黨」首領的身份，在延安的羣衆大會上說：「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爲他是好的作家和天賦的文學家，並且因爲他側身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前衛，把他全部的力量，貢獻給革命鬥爭。」這些話，既出自生長在中國人的口裏，那應該是可信了。爲着證明這些人們，本國的或外國的「觀衆」，是否正確，需要從被歌頌者的全部生活的記錄中，找覓資料。換句話說：需要爲「魯迅」作忠實的傳記。

可是，依本書主人公在「阿Q正傳」中的告白：「傳的名目很繁多，列傳，自傳，內

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又從他對牠們的解釋，寫「列傳」的人，是蘇聯的史官或威爲中國歷史諷刺劇的「蘇維埃中國」的史官；寫「內傳」與「外傳」的，是景宋女士和胡風先生們，筆者對他，只能寫一篇「本傳」。『但從我的文章着想，因爲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閒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裏，取出「正傳」兩個字來，作爲名目。』（「阿Q正傳」）

無需說，我不是效法本書主人公，企望「鳴驚人地，達到「人以文傳」的目的，我更不是，企望「文以人傳」，使我與被本書主人公有關係者與負有歌頌義務者所稱之「革命導師」一同名垂不朽。我一些也沒有這種念頭。我之寫「正傳」，也許會收到相反的成果。但，這應原諒我。我不是愛這位已死的「青年導師」兼「革命導師」太少，而是愛文學或真理太多。因此，我願捨身爲習慣的箭鏑，我用真正的史實和可靠的證據，可惜我缺乏文學賞鑒的能力，說我所知道的，我所該說的。我認爲識別一個人的偉大，應從他的一生生活的分析着手。歷史上有恆河沙數似的史實，爲我們指示：被歌頌的與被侮蔑的，有同一的不可靠。因此，我們欲認識禽獸，是用同一的方法。這恰和德國哲學家尼采在「蘇魯文語錄」中所說的一樣：

「人是一根索子，聯繫於禽獸與超人間。」

由這一前提出發，希望本書的閱者，看完本書主人公的「正傳」後，再評判他是否「

超人區，似將並法為晚。對「自新」一書告白，「父勝長難言也。最難言者，國人，誠以自

一而後出置學區國也。

×

×

自白依本職注大公公的「自傳」序言「我於一八八一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府越縣的一家姓周的家裏。祖傳種做「薛詒止尚氣，加個註釋」八月三日，生於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名樹人字豫才，必洛稔壽。起發我們先回碼頭看當周家添了一個少爺時，他的國家，究竟是怎麼樣了。出於歷史告訴我們「老天的帝國，變為次殖民地，是在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這筆筆者執筆時問約近各個世紀。要南京條約一東縛後的中國，迅速地變換地的面容，首先是利用該條約的開放商埠，其他「夷大匪繼」嘆喲喲「踐踏神州。接着是，內部週期性似的農民暴動的爆發而並建立「太平天國」。到一八六四年洪秀全的革命火燄消失時，滿清的王朝已登玉皇中而不平鎖鍊。儘管頑固的執政者，還是抵抗新文化的侵入，却驚訝於「夷人」的壓甲利兵，不能不作若干的讓步。這些就是「一八六六年派知縣熾椿率同官生遊歷外國，依左宗棠奏請在福建馬江設官工廠製造輪船；一八七三年設鐵路局；一八七六年准左宗棠借洋款十萬兩，便學鴻章洗滌檣等的奏請，選派福建前後學堂的學生三十名赴英法兩國學習機械製造工藝；一八九〇年准鴻章奏請於陸路設立電綫。比例於這些在文化上的讓步，若干屬地或邊境也開始了天改變。這些就是：一八六七年法國收安南的柬埔寨為保護領地；一八六八年俄國收布哈拉汗為保護國；一八七三年法陷安南河內城，俄收布哈拉汗為保護國；一八

七六年俄滅浩罕國；一八七九年維新後的日本佔領琉球；一八八〇年法兵進駐安南順化府。岳以上的簡單記載，我們十分明白：周樹人時代的中國，已失了過去的尊榮，正像陳列於租上的羔羊。藩籬開始盡撤，似賣身契的不平等條約也行將加多；但却有光明的一面，那就是新文化的侵入，可以腐蝕昏庸腐朽的滿清王朝。無需說，在這種環境中，當時的人們，自然會產生民族革命的思想，惟還難斷定應有社會主義革命的路線。誰能夠料想到，這以紹酒出名的縣城，會產生後日為蘇聯「辯護」，並充當「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呢？就是劉伯溫也缺乏這一本領。事實上，也並沒有這麼一種奇蹟。

若使說：上面引述的客觀情況，不足斷定生在那樣環境裏的人，應負着民族革命的任務；那却有充足的理由，下個斷語說：在那樣時代中，難於產生無產階級革命的指導者。因為既沒有無產階級，（沒有近代的產業），也沒有無產階級的理論。（一八六七年「資本論」出版了，但還未和鴉片同時輸入。）

也許反對這論斷的人們會說：這是本書主人公降生以前的情況。時代既像洪流，怎麼能以前生的條件，斷定他的後來呢？這論斷，似乎有他的理由。可惜，歷史愈演變，愈使人們明白：中國須走過民族獨立的道路！爲着明瞭牠，容我們再說本書主人公生產後的種種經歷——一直對他留學回國止。

周樹人先生的家世，依「自傳」的告白，「父親是讀書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

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可是，他卻說，還有一位祖父，在北京（根據「年譜」）。母親給他的印象和影響，似乎比他的父親要大些。一八九六年，他六歲了。和當日一般的幼童一樣，他到私塾去啓蒙。他的教師是叔祖玉田先生。他有一個綽號——這是宗黨給他的——叫做「羊尾巴」，「譽其小而靈活。」他時常隨母親到安橋頭外祖母家遊玩。依「魯迅通」們的考證，他後日的小說材料，有若干是出自這地方。

一八九二年他十二歲了。故從壽鏡吾氏讀。依他的自白（可以說是回憶），他在這時對於二十四孝內的「老萊娛親」與「郭巨埋兒」，獨生反感。是否有這宗事，別人難於證實。但我們却否定他的可能。

一八九三年他十三歲了。依「年譜」：「三月祖父介孚公丁憂，自北京歸。」「秋，介孚公因事下獄，父伯宣公又抱重病，家產中落。」他在「自傳」中也說：「聽人說：在我幼少時候，家裏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愁生計。但我到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裏，有時還爲乞食者。」他又在「吶喊」自序中說：「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賃舖和藥舖。」但我們却不明白這大變故，究竟是什麼。由「魯迅全集」找不出牠（註）。

（註）筆者有一位舊友——但現在爲着他是中共的黨員，或是並被除的隊員，而彼此不通音問了。他也是紹興人。他爲着文化的工作，在上海會和筆者有一次偶然談到魯迅

不單顧乎是爲魯迅募出版物的經費。他說：魯迅的父親（也許是他的祖父），我忘掉了）（以家貧，常在考場內拾替。有一次被檢覺入獄。周氏因之全家搬居杭州牢獄附近，至大邊苑入死亡止，這友人的名字，寫着他速在新加坡（寫後知道又逃避他處了）及別的理由中，暫不說出。……）

……一九九六年，他十六歲了。因爲父伯宣卒（年三十七），他的境况，依「自傳」：「我漸漸至於極度的窮困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備王二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爲我總不肯學做森或商人。」他又在「吶喊」自序中咳一口氣：「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路途上，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由於，人情總是景上添花，所以，他不能夠靠別人，而要靠自己。到一八九八年，他便「旅行到南京，致入水師學堂（在機關科）」。但「自傳」：「這學校的功課，却不是這位青年所欲學習的，所以，」大約過了半年，他「又走出，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自傳」）「年譜」的作者，爲他註釋：「對於功課並不學習。」既然對於路礦的功課，也感不到興趣，爲什麼他要選這樣的學校？是爲着衣食呢？還是爲着別的呢？似乎，在這裏我們要對十八年來（）也就是本書主人公呱呱墮地後十八年來中國的状况，加以論述。

……當周樹人氏往後兩年，香港已有被人們叫做「四大大」出現。儘管滿清的政府已不自覺地在接受西洋的文化，但她却不識發現能夠解除內在的危機與外患的變異。不僅安南已

入法人之手（一八八三年），就是朝鮮，新起的日本也在垂涎。一八八四年法國的陸軍攻諒山，海軍攻台灣，這雖然引起翌年李鴻章編練「北洋水師」，但却無補於英滅緬甸。這些重大刺激的後日中華民國創造者，「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但和者無幾。一八九四年，滿清政府被新起的日本帝國主義重創於朝鮮和遼天，而與中會就在這期間成立，到「馬關條約」簽字後，發生「廣州起義」。在這時候，不是一二人心裏懷着「革命」的大逆不道思想，牠却普遍地散佈於「有識之士」的腦中。但正似物理的規律，在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反作用」——這就對已成歷史發展的事實而言——牠就是康梁的「公車上書」。此後，這兩個歷史的浪流——一個是推翻舊的建立新革命的革命，另一個是改革舊的弱點的維新——因甲午的戰敗，而泛濫全國。這個浪流，恰和當日滿清王朝派遣留學生的政策相呼應，便若干受西國文化及產業發展刺激的青年，分別地投奔於兩大陣壘。就在這一時期，我們的周樹人先生無形中受牠的影響。如果，他不想革命，如果他不自覺維新，他總應有富國強兵的头頭——如是他對這兩者一些也沒有，那他的知識水平要落在當日的青年的後面，只是爲嗚呼而旅行於「水師」與「路礦」之間了。

究竟他當日究有何種的感覺——談不上「政見」，難得到正面的解答。因爲老於世故的牠，對於自己的弱點和缺口的金人似的，從未會坦白地公開過。如果我們細心地在他的雜誌中去覓證據，那只有這些話：「我生長在偏僻之區，毫不知道什麼是滿漢，只在飯店的招牌

上看見過。「滿漢酒席」字樣，也從不引起什麼疑問來。」（一九三五年「病後餘談」）雖然他會接着說：「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辯子。」但到知道「這辯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時，是在他自稱「我有知識的時候」。這時期是否是入南京的「學堂」呢？也許是，也許不是。但無論如何，周樹人氏在青年期，並不和今日捧他的人們所誣證似的，有什麼「超人」的銳感。他只是無數平凡青年的一個。這有什麼關係呢？依目前若于「前進者」看來，他的「偉大」不在於早年是否有分別「滿漢」的感覺，更不在於他能否選擇「革命」或「維新」做他政治活動的目標，只在於他後日能否擁護蘇聯，和為她的主持人「辯護」！

也許就為着他不能夠區別「滿漢」所以一九〇一年末在路礦學堂畢業後兩月，被江南書院公所派赴日本留學。一九〇二年他到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首都。依「年譜」的記載，他先進「弘文學院」。這時候的東京，是革命黨與維新黨人才會聚的所在，他們的論爭，似乎引不起這二十二歲青年的注意。雖然他會為「浙江潮」什誌撰文（一九〇三年）並譯「月界旅行」，而還對於他後日的成名，並無關係。一九〇四年，他的祖父介孚卒（六十八歲），他自己也於當年八月進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為什麼他要學醫呢？依「自傳」：「原因之一，是因為我確知道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稱為讀過明治維新史的人，對於已成名時（一九二五年）自傳者的自供，都瞠目不解。不錯，維新前本已有了醫學（他的辯護

記載，見拙作兩卷「日本明治維新史綱」的附錄。但醫學對這日本歷史重要運動之一的明治維新，有很大助力，却難找出「很大」的證據。也許魯迅主義者會說：這有什麼關係呢？偉大的魯迅，主要的任務，不在於有沒有這麼三個知識，更不在於計較有沒有說錯了牠。

那麼他就這樣地學成了醫學回國濟世救人嗎？不。自「自傳」說：「學了兩年。這時正值俄日戰爭，我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國債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新文藝。」由學醫而轉到文藝，原來是由於這麼一個觀點。我們可以設想：「敢這樣想嗎？一個坐在台下的中國人，對於自己同胞的被斬，絲毫不發生對他同情或憤恨凶手的感覺，只於身首分離時，這起「醫好幾個人也無用」的想頭。」

我們暫拋棄今日君子魯迅的崇拜者提起他留學日本時曾加入革命團體（詳後）的記述。因為這是當時青年在東京應有的一舉。我們應知道，二十六歲的他，應母親之召，於當年六月回國和「山陰朱女士結婚」。婚姻是否滿意，無從查考。「年譜」作者，告訴我們：他於「同月復赴東京」。再踏東京的他，是否就在這時（也許在回國前），曾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了」。我們難於確定「莊」的「板他自述」約在這時候，他還想「往德國去」，但也失敗。至於從事文藝的成績，留「來的」，是收集於「墳」內大部份關於科學方面的文字。

（註）「年譜」載一九〇七年二十七歲夏，擬辦「新生」，以費絀未印。後為「河南
大漢」撰文。其辭略謂：「吾國之運，至極而衰。嗚呼！其將何如！」
一九〇八年，他二十八歲了。屈指一計，他在日本已經七個年頭。在這七年中，中國思
維新；但在同時，中華表麵的創造者却已在他的生活史中記錄了：「倫敦蒙難」，「惠州起
義」，「成立同盟會」，「和潮惠之戰」，「欽廉定戰」，「鎮南關之戰」，「河口之戰」。其
雖然有數次的失敗，而他的事業却深入人心。試問我們的周樹人先生呢？他的正式「革命
」記錄，如「年譜」所云，是於該年「從章太炎學，為「光復會」會員」。章太炎在當時，
雖是一個頗有滿清的人，但他在整個大革命蓬浪中，却演了一個丑角。更使人惶惑的，是當
「欽廉之戰」的組織者計劃大舉時，他成爲起義的告密人。看下的紀錄：「
餘人：然後集合欽州各鄉團勇六七千人，而後要同……新軍約六千餘人，便可成一聲勢
浩大之軍隊，再加訓練，當成精銳，則兩廣可收入掌握之中。而後出長江以合南京武
昌之新軍，揭破竹之勢成，而可收完全之效果。乃不期東京本部章太炎等以正月先生得
消息，日政府欲滿清之請，令出境，由日友鈴木勳贈川資，不能多存「民報社」之誤會，常起
風潮，思乘機破壞先生之主張，以快私憤；揚言查野所購槍枝，全屬廢物，遽以明電電

香港「中國日報」謂：此項武器，萬不能用。因爾風聲外洩，被船不能如期到達，且事
得在白龍灣登岸，於是前功盡廢。」「胡去非編：「總理事略」九八頁）。

但這對於二十八歲——將「而立」之年了——的周氏卻沒有什麼感覺。船就在這時候，
爲章太炎過去的言論所述，投奔他的足下。我們由之明白：到周樹人變爲魯迅時，他一貫繼
成爲國民黨的對立人，原來是受其老師的影響——如果說不是一前通——的結果。

在這時期，我很抱歉地未曾向讀者報告：正像周樹人先生之愛內山完造，他的二弟周樹
人，也愛日本帝國的一切。自然，我們不能把北平偽組織的教育負責人漢奸周作人的賬，歸
在他的老兄的名中，但這一對兄弟難弟生時受日本文化的薰陶，却沒有絲毫差異。所不同的是
，後日兄爲蘇聯的「辯護人」，「護人」，而弟則爲日本的走狗。如果問他們爲什麼不愛祖
國，那就難劃分界線了。

似乎漢奸周作人在當日也是文藝的嗜好者，所以，兄弟倆合譯「域外小說」。他的第三
集輯印於次年（一九〇九），就在這時期我們的留學生團體了。爲什麼，他急於返國？「自
傳」說：「因爲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

回國後的他，是否和當時革命的青年一樣，從事革命的工作呢？我們不僅不應忘却他
「光復會」的會員，尚應記起他是有「知識」了，他能分別「滿」和「漢」。事實也是如
此，提醒他應有這界限的區分，我們早說過是辯子。而他的辯子，依自述：「留在日本，

半送給客店裏的一位使女做了假髮，一半給了理髮匠。」（「病後餘談」）既然他剪去頭髮，那應該從事「光復」的工作。但鑑於同志徐錫麟在安徽的被殺，正像他後日所寫怕「瞎」的阿Q，他只好把「光復會」的宗旨放在肚子裏。他自述回國的狀況，值得留意：

「我是在宣統初年回到故鄉來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麼？索性不裝了。

充當了一個洋鬼子」兩個月的他，先在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成績怎樣，無從稽考，只知道他於翌年「就走出」，任紹興中學堂教員兼學監。他自述這時期的處境：

「我回中國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員，還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鄉故鄉紹興中學去做學監，却連洋服也不行了，因為有許多人是認識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裝束，總不失為「裏通外國」的人。於是我所受的無辮之災，以在故鄉為第一。」（「病後餘談」）

這些敘述，使會讀「阿Q正傳」的人，記起了他所寫的一段：「這也真是阿Q最討厭的一個人，就是錢老爺的大兒子。他先前跑上城裏去進洋學堂，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了，半年之後他回鄉

家裏來，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他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後來，他的母親到處說：「這辮子是被壞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來可以做大官，現在只好等留長再說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稱他爲「假洋鬼子」也叫「裏通外國的人」。

見他，一定在肚子暗暗的咒罵。究竟「山陰朱女士」曾否不跳「第四回的井」，和他的母親曾否哭了「十幾場」，那怕連景宋女士也不知道的。當他除去在上海所造的「假辮時」，曾有這感覺：「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依近數年來對他的恭維，他不僅是「真實」的人，而且是超過「賢人」。那他應該以「學監」——等於現在的「訓導長」——資格，教他的學生以真實了。看他自供：

「學生們裏面，忽然起了剪辮風潮了。很有許多人要剪掉。我連忙禁止。他們就舉出代表來詰問道：究竟有辮子好呢？還是沒有辮子好呢？我不假思索的答覆是：沒有辮子好。然而我勸你們不要剪。學生是向來沒有一個說我「裏通外國」的，但從這時起，却給了我一個「言行不一致」的結論，看不起了。」（「病後餘談」）

只許自己剪辮，不許學生動手，這和「假洋鬼子」不許阿Q革命有同一的武斷。當他禁止青年剪去「服滿」的象徵時，忘却自己是「光復會」會員，更忘却同會會員徐錫麟的舉債，他只爲避免「滿洲人紹興知府的眼睛」，而爲大清天子服役。我們不說，終其一生，

不是「言行不一」的人，而由這一宗事，却足使我們明白，他在每一時期，都能夠抱「各盡其主」的精神而辦事。因此，正像他充當紹興中學學監而為「皇上」禁止學生剪辮，後日與事袁世凱，和充當徐世昌、黎元洪的小吏，也不對「洪憲」等等罪惡，挺身抗辯，只在章士釗免他的職時，他方憤然地說：「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與革命黨了。」

二 十四年僉事

當本館主人公任紹興中學堂學監時，「中國的桌子，開始跳舞。」維新黨，由於滿清政府在各省設立諮議局，在中央設立諮議院，而被解除政治鬥爭的武器；而革命黨的勢力，却更加擴張。但這對我們的主人公，却毫無瓜葛——雖然他曾是因「蘇報」案而著名的章太炎的學生，更為其師所主持之「光復會」的會員，但終為着「言行不一致」，在過着「教育界」的生活。翌年，他三十一歲了。這是他的幸運或不幸的時代呢？我們要答覆他，先明白推倒滿清王朝的革命洪流，對他的影響。

一九一一年發生辛亥革命，改元「中華民國」。當革命發生前，周樹人先生離開紹興中學堂。走出校門的他，依「自傳」：「沒有地方可去，想在一個書店去做編譯員，到底被編絕。」那怎麼辦呢？幸運的他，恰逢革命，舊的習慣被革命的洪流沖洗而去，我們的「假釋

鬼子」便自然而然地登台。於是，從大門離開紹興中學堂的監學，却被光復的政府，由另
門請入充當紹興師範學校的校長。

大概就在這時候，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孫中山先生被舉為臨時大總統，蔡元培被任為
教育總長。我們應該知道，蔡氏是「光復會」的會員，又是浙江紹興人氏，他對周樹人氏在革
命前，有無關係，尚不明白，而位於一九一二年應蔡氏之召，任教育部部員，大概總由於會
是「光復會」會員和同鄉的緣故。他既未曾對革命有何貢獻，而於新政府成立時，居於充當
小吏。職雖微小，總可自豪。

到南北議和成立，臨時大總統退位，袁世凱被參議院舉為臨時大總統時，以唐紹儀組
內閣，蔡元培氏繼為教育，周氏就隨臨時政府北移，改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但是
，自袁世凱私人陸徵祥繼唐紹儀組閣後，七月間同盟會四閣員——王寵惠、蔡元培、宋教仁
、王正廷相率同時辭職，而教長一席，由孫毓筠接任。照應稍為明白的人，都知道這是反駁
的開始，那麼，曾為「光復會」會員的周氏，是否與其部長同時進退呢？不是，他仍做他的
長。及萬源濂繼長教育（同年七月末），他於趙秉鈞（袁世凱私人）代國務總理的期間，
為教育部僉事。此後，總統、國務總理及教育總長，時有更迭，而我們的周樹人先生的「官
」，却未曾更動，要明白北廷政治舞台上人物更動的歷史意義，先列下表（註）：

大總統
或執

袁世凱

趙秉鈞

曹錕

吳佩孚

曹錕

曹錕

曹錕

曹錕

魯迅正傳

袁世凱

唐紹儀

蔡元培

陸徵祥

范源濂

趙秉鈞

劉冠雄

段祺瑞

陳振先

朱啟鈐

董鴻諱

段祺瑞

汪大燮

熊希齡

嚴修

孫寶琦

湯化龍

徐世昌

張一麐

陸徵祥

張一麐

徐世昌

張一麐

陸徵祥

張一麐

徐世昌

張一麐

段祺瑞

張一麐

段祺瑞

張一麐

段祺瑞

張一麐

段祺瑞

張一麐

稱帝
取消帝號

伍廷芳

李經羲

江朝宗

王士珍

段祺瑞

錢能訓

傅增湘

傅增湘

袁希濤

傅嶽棠

范源濂

梁士詒

顧惠慶

周自齊

顏惠慶

汪大燮

汪大燮

汪大燮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傅增湘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黎走該院攝政高氏爲主席

國務院

張紹曾 彭允彝
高凌霨 黃郛 鄧

曹錕

高凌霨 張國淦

孫寶琦

孫寶琦 張國淦

顧維鈞

顧維鈞 張國淦

黃郛

黃郛 王九齡

段祺瑞

王九齡

直奉戰爭

攝行大總統職務

臨時執政

(註)內中未指明教育總長的實任或代理，但却依任期的先後而排列。

以上，由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五年間，北政府易大總統六，攝政二，臨時執政一，計被攝

爲「元首」的六人(重覆不計)中間尙有一個「洪憲皇帝」。至於教育總長，可考的，在攝

十四年中，先後更易的計二十七人。在那多變的北廷中，一個人能夠久任官職，雖屬「僥

」之類的小吏，亦爲難能。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不是抱着「同流合污」的決心，在那腥羶

世界中，轉聖的革命者，是無法一日安居其位的。幸好，這時候的周樹人不是「革命導師

魯迅！

再就這十四年的政治現象說來，首先是袁世凱推翻民國，改元「洪憲」，我們的「僥

」並未表示他的贊成或反對；但依「年譜」的記述，當一九一七年張勳復辟時，他却爲着

子留在東京，「憤而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都。」然而，在北廷許多離奇政變中，他也僅僅「憤」了這一次，似乎直皖戰爭，兩次直奉戰爭，對他都沒有感覺——更談不上「不滿」了。因此，對承認二十一條件的政府，他可以充當小官，對「豬仔議員」所選的總統——曹錕——可以承認為「元首」，對軍閥所擁戴之「外崇國信」的臨時執政——段祺瑞——也可以默認。請魯迅的狂崇拜者盲捧者，對周樹人的上述政治生活，加以公平的批判，無需由筆者再做結論。

如說到這十年來的革命大事，和北廷有關係的，更使今日的「革命青年」驚訝。我們先說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這是中國現代史上重要記錄之一。牠似報告中華民族建立現代化民族國家的鐘聲。身處北京的周樹人先生，對於北京大學生的示威遊行等運動，究有何種的觀感呢？依他到一九二五所作「熱風」的「語錄」，却不應脫落——尤其是，對於中華民族再生運動的觀感，更不應脫落。他說：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服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刻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極面，簡直是乞丐軍的模樣。」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不感運

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得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

周樹人先生到以魯迅簽名「馳名」全國時，對於五四大事，只記着童子軍式的報章，至於牠的歷史意義等等，却未見提及。無需說：那些「示威」的學生運動，站在教育總會的立場看去，是可惜是可恨，怎值得加以探究？

可是，就目前人們的估計，魯迅是「中國的高爾基」，不但同情於「無產階級的革命」，而且本身就是該革命的指導者。如果這是可靠，那我們要檢閱日曆，看看在這「四年中」和「無產階級」有關係的事件，曾發生幾次：一九二一年有粵漢、京綏、蘭海各鐵路的大罷工，一九二二年有無數次的工潮；一九二四年有著名的「二七」事件，這可算是魯迅所說的「血債」，而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在其「全集」中，對這些事件，曾寫下若干的「雜感」呢？恐怕動於搞「魯迅語錄」的人，也難在其著作地層中，掘出有些相似的石來。然而，這有什麼關係呢？魯迅的崇拜者，也許會說：怎能把周樹人的賬記在姓魯的名下？

那麼，魯迅的生活剩下來的一——似乎可發生這問題——究竟是什麼呢？他除研究佛經外是「抄古碑」。他為什麼要幹這宗事？依他自述：「沒有什麼作用」，也「沒有什麼意思」。我「只能看做這是一般魯迅老爺的文雅。也許爲着這一原因，他住於校搖康樂。」

現在，我們回到前面去，探究爲什麼這位老於世故的僉事，被人們趕出於教育部大門之外。依「雜感」的記述，暗示章士釗的「無恥」，但這不能成爲離職的理由，因爲在那一大批長官中，比章士釗更加「無恥」的，還多得很。直接使章總長下令免周僉事職的原因，是女師大的事件。那時，臨時執政府派楊蔭榆爲該校校長，女師大學生分爲迎拒兩派，周樹人先生爲什麼以該校「講師」的身份，捲入風潮中，我們就在尙是該校學生「景宋」給魯迅的信中，也難找出捲入的理由。但可以如此推測：楊氏是章士釗委派者，周樹人是他的屬吏，俗語說得好：不怕大只怕管。於是，他不得不氣憤地走出辦了十四年公的教育部大門。

但這一被侮辱的案件，迅速地結束。當易培基調長教部時（一九二六年一月）他又被任爲「僉事」。易氏是故宮古物案件中人物之一，像這樣的人，居周樹人先生長官的地位，由以前的敘述，是不足爲怪的。

上面冗長地報告周樹人氏由三十二歲至四十六歲止生活的記錄，其主要目的是爲牠的附者指出：超過「不惑」之年的周氏，還未曾成爲一個革命者，只是北廷似蒼蠅的官僚羣中的一員。我們十分明白，在那樣腐化的北京官場中，周樹人氏能混了那麼久長的時間，是不容易的。他是否在那迎張李似的生涯中，和一般官僚表演了奴顏婢膝的醜劇，只有他的同僚曉得。但是，我們却不能專用這事實估計他。恰似他是周樹人僉魯迅，所以，他的生活也有黑暗與光明的兩面。如吳說：周樹人是代表黑暗，那在魯迅的著作中——對於舊勢力的憎恨

，却是代表光明。魯迅所以能夠成爲黑暗勢力的反抗者，爲着他是周樹人；周樹人冗長地受侮辱被壓迫的生活，使他假魯迅之口，排洩出反抗的氣憤。因此，我們在周樹人的生活裏，見到向卑劣者屈膝敷衍等暗影，而在魯迅的「雜感」中，却面對映現那些人類不該有的卑劣的光芒。只有被侮辱的人方知道對侮辱的反抗；只有被壓迫的人，方明白對壓迫者反抗。妙處，現在的青年，只曉得魯迅在若干方面的光明，而不知於他的黑暗。

一個人有了兩重人格的生活，只能歸咎於時代。時代迫人們過着那樣的生活！我們的周樹人先生就是牠的活證。

這一點，是認識魯迅一生行爲的主要尺度。不明白着牠，就難於解釋，他爲什麼像立提莫司，表現紅與藍的反應。對於牠，在後面尚有詳細的論述。

當周樹人過着官僚的生活時，却有魯迅起而暗中反抗，因此，在本段結束前，我們不能不述魯迅的活動。

我在前節早說過，周樹人氏爲着受日本電影的影響，捨醫從事文藝。他曾爲這一目的，在東京糾集三五同志，創辦「新生」雜誌，但沒有成功。依他初期收在「墳」中的論文，他對文學的認識，還很淺陋。如「文化偏至論」，如「摩羅力說」，確確確自己在「題記」中所說，只「算是生活的一部份的痕跡」。但卻有一個強烈的暗示，就是他在這時期，注意

關於文學的著作，並曾讀了若干名著。他最喜歡閱的，究竟是那種作品呢？按他後來的追述：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於東歐。因此所看如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會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和波蘭的顯克支微，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南腔北調集」）

由他的老弟漢奸周作人的追憶，他確有這麼一件事，因此，我們不能懷疑他在「我怎末做起小說來」一文中，對於上面的供述，有若干誇大的處。但這個趣味，自隨教育部北遷起，似乎沖淡了若干。他由一九一三至五四運動止的工作，依「年譜」的報告是如此：

一九一三年三十三歲，校嵇康集

一九一四年三十四歲，研究佛經

一九一五年三十五歲，輯「會稽郡故書雜集」一冊用作人名印行，刻「百喻經」。

一九一六年三十六歲（？）

一九一七年三十七歲（？）

當他埋了頭整理「國故」時，一九一五年社會已起了大變動。那就是「九月十五日」新青年」創刊了。這是「五四運動」之一產物。牠對於此後文化運動的作用，我們暫置不管；而對於周樹人一變為魯迅的關係，却值得一述。

「新青年」的編輯，後因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改名澤東「自傳」，他於當日文化界最燦爛四星。他對於周樹人的影響之佳，「南腔北調集」的告白：「他『催促我做小說最着力的『催』。』（一一一頁）。但『陳氏』催促』的周氏，當日對於『新青年』，並不熱心；只一九一九年，他方成爲『新青年』的投稿者。他的第一篇在該刊物登載的，是該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第四卷第卅期的『狂人日記』，署名魯迅。

爲什麼用「魯迅」兩字呢？他在「阿Q」傳的成因」中說：「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I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白樹，索士，合，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在那時的新青年編輯者不願還有別號一類的署名。」也有人說：於「迅」上加「魯」，是爲着用母親的姓。

魯迅在「新青年」發表文藝的作品，和「新青年」在時代思潮中所表現的任務，是兩不關涉的。我們已說過，他對於「五四」是那麼漠不關心，更難冀望他對新思想有什麼意見。他只算是夾在大車輪中的泥土。

但是，他自此起，却把「國故」與「佛經」拋置一邊，開始創作和翻譯。當他四十歲時，他譯了武者小路實篤的「一個青年的夢」，阿志跋殺夫的「工夫殺惠略夫」，四十二歲時他譯了愛羅先珂的「桃色的雲」，四十三歲時他印創作最高峯的「吶喊」和「中國小說史略」五卷（註）。

(註)陳源(西滬)教授在「致志摩」中，對後一本書，如此地指播道：「他常常挖苦陳大家抄襲。……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却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份。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臺灣農編：「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三九頁。)該書的下卷與厨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同印於翌年。

「吶喊」是魯迅創作生活中最大的成就。我們把牠留於後面作更詳細的估評。這裏還要說明的，是他僉事期生活的餘波。他自「狂人日記」發表於「新青年」起，相當有了文名，也許又為着是「新青年」上作者的關係，他被急進的大學生所注目，因此，他於一九二〇年兼任北大及北高的講師，到一九二三年，他改執教職於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和世界語專門學校。一九二五年，他被章士釗趕出教育部大門，却走入北大，北女師大學，和中國大學等學校。在這個期間，他又編「國民新報」副刊及「莽原」雜誌。我們對於他的著作，除文藝外，關於「雜感」在這時期，可以總一句話說：未曾直接地與壓迫者對抗。關於這一點，李長之氏在「魯迅批判」中也有如此公平的估計：

「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他從三十七歲到四十三歲，是他實踐了作「精神戰士」，開始向封建文化攻擊的時期。這時期的開始，是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以及「熱風」裏頭一部分雜感的時候。他的攻擊，在這時還比較空洞，敵對的東西，也多半不

「在身旁。」（二頁）由和君。對於這事，亦甚和善。其時，頗能說東西。魯迅學不該回事實上，他敢大舉地樹敵。人也任於他離開北京之後。但我們却無誤地說，胡樹人或者認在這時期，只是一個寬途不刺的「會爭」，因只是三個具有成功條件的「文學家」。他既未曾任胡青年的「導師」，他也不是會「事」了任何反動者的「命」的革命者。他的官僚生活，更不像極浪的「講稿」，就是他固著作，也不是對什麼階級表同情或表現煽動作用。他就是這麼一種人。目前若干人們，對他的過大恭維，和他的生命史有着莫大的偏差。易致露着保個樹點，用死人嚇活者。或且換句話說：利用死者達到自己政治上的陰謀。

三 吶喊

「吶喊」儘管「魯迅全集」有二十卷，而內中屬於文學的，却不多。有些人，把他的「雜感文」視為文學的作品，同時又視為政治鬥爭的論文，有些人，認為「吶喊」及「彷徨」是他的創作中的傑作，但我却着目於前者。也許是彼此的眼光不同，也許是我對於文學的鑑賞力尚差，但我要先講述自己的見解。

「吶喊」共有十四篇創作，除「阿Q正傳」，分節探究外，這裏只從十三篇內選我所喜歡的，加以主觀的評判。

「吶喊」的對象，依他在「自序」中告訴我們：那是他「年青時候」所「做許多夢」中

「不能全忘的一部分」。

何以，他在中年會那麼清楚地記起過去的「夢」呢？他在同「序」告訴我們，由於他「叫喊的生人中」，「並無反應」，「如置身荒涼的荒原」，感到「寂寞」。寂寞「大毒蛇，纏住了」他的「靈魂」使他「痛苦」。雖然，他曾「用了種種方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以為可使他「回到古代去」，但所收的效果，只是使他「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還未能忘懷於當日，……的寂寞的悲哀。……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也為着「上面所說的緣由，便撰之為「吶喊」。」

「自序」的話，除證明我在前節所說魯迅有兩重大格外，還有一個極大的暗示，那就是，所描寫的却是構成他青年期的夢的一部份。這一部份，是魯迅作品的特徵，同時，也靠他的文學天才把他掀示出來。因為，「五四」後的人們的思想眼光都注聚於「將來」，所以對於魯迅所寫的「過去」，在當日不能就引起一般青年的注意，可是，對「過去」的認識，却是趕「將來」的指標，因此，隨時間的消逝，魯迅在「吶喊」中所重現的事實和人，都深深入於人們的腦中。又為着，做這工作的，費有他一個人成了功。別些人，也許「將來」的勾引，而放棄他。……所以，他的作品，所放特殊的風格和特殊的「過去」，獲得人們的賞識。這些估計，可以說明：魯迅不在戴着當日文學桂冠的創造社人們的

貶難下而沒落的原因。

所謂「過去」是什麼呢？那就是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這時期的中國，是受難的國家，看不見光明，只遮着黑暗。人像瞎子，在那可使人悲哀與頹喪中摸索——否則，他就是革命者。自然，我們不是說，魯迅先生是一大羣摸索者的一個。他向沒有摸索的資格，他只在中間走了幾步路，因為他是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降生的。真正的摸索者，是和他的祖父或他的父親同時代的人們。魯迅先生的幸運就在這裏。他目擊他們的摸索，自己却豈不肯摸索者同輩和力。而跨進另一時代去。這不難想像：具着這一資格的人，是舊時代的忠實證人，却是新時代的創造者。——「超人」則屬於例外。因此，魯迅先生和現代的作家，如茅盾先生們，在著作中，走了相反的路。一個慣於描寫「過去」的人們生活，而另一個却屢登人物及其生活的圖畫者。

還要知道的一點，舊的時代，要用舊時代的文化教養，纔能盡了描述者的任務。這一條件，魯迅先生當旅行到南京前已經預備好了。也爲着這一原因，人們有理由——我相信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把他和契訶夫對比。他的清潔文體，確有些和契訶夫相肖似，但可惜，當他到晚年時，被「前進」與「左傾」所誤，跨進政治火車中，忘却了文學給他的任務。因此，他不能像福樓拜，再有任何傑作，只剩了若干靠舊文化教養而取得之超過一般青年的文體，寫了自供有兩重人格的難感，和自覺的充當他所欲充當之政治勢力或外族的工具。

魯迅所知道的「過去」，究竟是什麼呢？一句話：那就是落後的農村。現在，由「吶喊」的人物，交織成下面的圖畫。

魯迅幼時常往外祖母家遊玩。因此，他對於農村的生活，直武中年還能回憶。他在作品中，有了「魯鎮」，「平橋村」，「趙村」等落後的村鎮。「平橋村」是一個僻遠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是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魯鎮」是離平橋村五里的較大的村莊（同上）。魯鎮，在「孔乙己」，「明天」，「風波」和「社戲」中都提到牠，除知道「早晨從魯鎮進城，傍晚又回到魯鎮」之外，關於村民人數等等，沒有明白的描寫。但我們却可由幾篇「短篇」中的「遠」，浮現這一印象：牠要比「趙村」大，在大城市附近，交通便利，那裏有讀者熟悉的「咸亨酒店」；有門第不算小，請孔乙己抄書的「何家」和「丁舉人」；有一大羣落後農村中的人物，如七斤，七斤嫂，九斤老太之類的男人和女人。這些人物，對於摩挲數年的陌生，而對於魯迅却有深刻的印象。他就將這深刻的印象，構成他的成功作品。

現在，我們再從他的作品，探討所映現的形形色色的人生。

給魯迅先生最深刻地記憶的是孔乙己。雖然，當他執筆時（一九一九年），是在五國運動那一年，像孔乙己那樣的人物的沒落，似乎却因這運動而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應該受滿清王朝若干恩惠的人，現在將失去載已失去這王朝；應該充罵滿清王朝給他以不幸運命的人，

現在却無力脫離他所加於他的「八股」等鎖鍊。於是，生活鞭打他，正在激變的社會拋棄他，他就像墮入深淵的大石！儘管他身上還穿着「長衫」，口裏說着「之乎也者」，他總要成爲人們戲弄的對象。他既不能和「丁舉人」排列一起，就降到「咸亨酒店」幫櫃之下。他在工匠或徒弟的眼中，除了「身材高大，青白臉色，縐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洗。」外，只是一個像玩具的活人。因此，人們奚落他，玩弄他，嘲笑他，他只能回報以：「你怎麼這樣還空污人清白……」。但當奚落者，玩弄者，嘲笑者進一步喝道：「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了何家的書，吊着打」時，他便似乎是鼓起勇氣地，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齊人的事，能算偷麼？」

似乎是沒落者所遵守的規律，沒落者愈自棄。我們的孔乙己，便是按這規律而苟活的人。儘管他「不會營生」，但却「寫得一筆好字」。在那時，這可算是他的生活工具，他却不希望牠！他的「好喝懶做」的壞脾氣，使他淪爲偷竊賊。這個行徑的報酬，是被丁舉人「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他此後，和常見而不再注意的乞兒一樣，不知道那時候償還了他的命運所注定的苦難！

生在十九世紀起初期的人，說不定在他的生長地中，會看見過孔乙己。魯迅先生的天才，把這一典型的人物，映現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青年的眼前。他並不是諷刺他，而是同情

他。我們可以相信：讀完「孔乙己」的人，會和牠的作者一樣，對孔乙己表示同情。這便是先生父親時代讀書「沒有進學」的文人的悲哀！

在孔乙己上面的鄉村人物，便是「阿Q正傳」中的「趙大爺」或「舉人」。這是舊社會在農村中實際統治者。但在「趙大爺」與「孔乙己」之間的，尚有一種人，他就是「風波」中的「又矮又胖的趙七爺」。作者對他給與下面的描述：

「趙七爺是鄉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里方圍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紳士；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而且能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忠。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

像這一典型的人物，是和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農村中的「布爾喬亞」一樣的，可是，法蘭西的有產者，能夠在大革命中表現毀滅卡伯特王朝建立自己王國的力量，就判不得已任奔那帕特登臺時，也未曾放棄自己物質上的利益。我們的「趙七爺」却非如此。他既沒有建立自己王國的胆力，只把眼睛向後看去，成爲「遺老」，成爲已崩潰舊社會的一塊小沙石。他忘却自己就是趙子龍，却要在「三國志」上找他的保駕者。結果呢？他「像道士」，留着「辮尾」，他滿心裏希望有皇帝坐蘭庭，他用「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

明白白寫着的，不管他家裏有些甚麼人」(「風波」)去威嚇目不識丁更不知世界是什麼顏色的七斤嫂。他的希望和他的威風，確是「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書上，所可惜的，執筆者却不是他，而是他的祖宗。雖然他預言：「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保潔的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敵之勇，誰能抵擋他？」但這僅是一現的泡影。因為時代走得比趙七爺腦子所想的還要快。「丈八蛇矛」敵不過快槍，「辮子軍」只適於紫禁城內排戲天戲的配角，不足扮演歷史的角色。

請閱者記着：「風波」是寫於一九二〇年。這時候雖然張大帥已逃遁，但他還有一大批的「同志」潛伏的農村中。這些人們，像我們所見的趙七爺，時常在他的天書上找覓保潔的人物，而他的預言，却不爲似七斤那樣人物所相信。所以，魯迅先生如此地告辭我們：

「過了十多日，七斤從城內回家。看見他的女人非常高興，問他說：『在城裏可聽到些什麼？』」

「沒有聽到些什麼。」

「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

「他們沒有說。」

「咸亨酒店裏也沒有人說麼？」

「也沒人說。」

「我想皇帝一定是坐龍庭了。我今天走過趙七爺酒店前，看見他又坐着唸書了，辮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

「……………」

「你想，不坐龍庭了罷？」

「我想，不坐了罷。」

除了讀書的人或接近他們的人外，還有的，就是「吶喊」中所顯現的一幕引起另一世代的人，用同情，憎恨的眼光去看待的人們。這些人，在村鎮中的生活，是怎樣呢？「吶喊」也給我們以逼肖的圖畫。

也許我們的作者是紹興人，所以，他的筆下的鄉村不缺少酒店的點綴。其中，最出名的是「咸亨酒店」。——「孔乙己」，「明天」和「風波」。若干史實告訴我們：「酒店」與「質鋪」是近代有產者積疊的工具，所以，較大的村鎮，常不會少着她倆。可惜，魯迅先生沒有告訴我們：「咸亨酒店」的老闆，是否和趙七爺一類的人物。因為酒店是積疊資本的工具，所以，牠有經常的顧客。這些主顧，多是「工人」——應該說是鄉村的日雇工人，手工匠等。這些人們對酒店的關係，和酒店對顧客，看下面的描寫：

「……」看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別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尺形的大櫃臺，櫃臺前預備着熱水，可以隨時溫酒。做工的人，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

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着，熱熱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裹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幾文，那就龍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些闊綽。只有身穿衫的，纔踱進店兩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嚼嚼叨叨說夾不吐清的也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眼看着黃酒從罇子裏舀出，看過罇子底有水沒有，又親眼將罇子放在熱水裏，然後放心；在這嚴重監督之下，房主也很爲難。……掌櫃是一副凶臉面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孔乙己」

到酒店來的人，除了喝酒外，還可以暢談所欲談的事。因此，酒店像茶館，成爲魯鎮間那樣村鎮的「消息靈通的所在」。那裏，雖沒有裝着收音機，但由城裏回來的人，卻可以報告若干爲大眾所要聽的新聞，而且消趙七爺之類在預言着皇帝將坐龍廷，或發出「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警告。可見，他們所報告的，不過是「什麼地方，雷公劈死才與姑媽」什麼地方，閻安送了「個夜叉之類。」（「風波」）要曉得，這是民元前後落後地方的一酒店」，本是現代消報可閱的茶館。

這在樣的地方，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吶喊」的作者，給我們以下的各式人物和他們或他們的動作。

第一個我應說的，是「藥」中的小桂。他是一個肺病的孩子，由他，我們得去尋引一

羣生動的以。老栓和康大媽爲着醫治他和她所愛的孩子的病，不請求醫生、而款迷信、用藥、自犯大鮮血的饅頭。在天將黎明的時候，作者用非常生動的筆，寫老栓這望教願的場面：和怎樣得到那染血的「藥」；也寫、老栓和康大媽的

「沒有多久，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後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裏也看得清楚。那走過前面的，並且看出號衣上帶紅色的饅頭。——一陣脚步聲響，一眨眼，已經擁過了一大簇人。那三三兩兩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趕；將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團靜圓。

老栓也向那邊看，却只見一堆人的後背；頸項都伸得很長，彷彿許多鴨，被無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靜了一會，似乎有點聲音，便又動搖起來，轟的一聲，都向後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幾乎將他擠倒了。」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那人一隻大手，向他攤着；一隻手却撮着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被殺的人，是夏四奶奶的兒子，罪名是：『他說：這大清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爲怕『滿門抄斬』，夏三爺『先告官』，劍子手是康大叔，但小栓吃了他並沒有好，到清明時節上墳時康大媽遇着夏四奶奶，正流下淚來，大聲說道：

「『瑜兒，他們都冤枉了你，你還是忘不了，傷心不過，今天特意顯靈，要我知道嗎？』」

……我知道了！……瑜兒，可憐他們坑了你，他們將來總有報應，天都知道，你閉了眼睛就是了。

還有不上咸亨酒店的，是農村的女人。魯迅先生由九斤老太告訴了我們某些地方的習慣。

「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歡用秤稱了重量，便用斤數當作小名。……伊年南的時候，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總之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何況六斤比伊的祖母少了三斤，比伊父親七斤又少了一斤，這真是一條頗樸不破的實例。所以伊又用勁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風波」）

婆婆所嘆的，是世界已經變了，是傷悼王朝的頹覆，而媳婦却在懸念她丈夫的剪辮。所以，當她從保皇黨口裏探得皇帝坐龍庭會引起全家的絕望時，便用筷子指著七斤的鼻子說：

「這死屍自作自受：造反的時候，我本來說，不要撈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進城去，滾進城去，進城便被人剪去了辮子。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現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這囚徒自作自受，累了我，又怎樣說呢？這死屍的囚徒……」（「風波」）

可是，看客中的八一嫂却抱着另一個見解。安慰她：「算了罷。人不是神仙，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時不也說，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麼醜麼？況且衙門裏的大老爺也還沒有告示。……」（同上）

會閱過以上各短篇小說的讀者，會有這一感覺。「阿Q正傳」內的六物，他們大半有的

主要的思想，他們也不會缺。因此，「阿Q正傳」不過是他們的大綜合、有藝術的綜合。爲什麼，魯迅先生會那麼關切落後農村中人們對於由辮子而引起的顧慮呢？他自稱：這是他不忘却的幼時的「夢」。但這類的夢，那樣深刻地記着，應從他的生活而得到解釋。長久地混在舊勢力的集中地——北京的他，遺老和保皇黨的活躍，甚至目擊辮子軍的「復辟」，自然而然地，使他回憶他幼時所目擊的所知道的舉。但，歷史却有這一諷刺：揭示遺老及其潛勢力的愚蠢的他，會在晚年跳過民族國家的階段，自己披上趙七爺所穿的紅色外套！

在「吶喊」中，還有一篇，無論內容和形式，都不劣於前述的各篇那是「社戲」。牠所寫的，又是一幅景畫。我們可以說，牠是他幼時生活的回憶。牠記他同母親回到外祖母家的事。曾生長在農村的人們，同時似乎是親歷其境。當我們讀到他乘月夜同一夥小朋友坐船赴趙村看戲時，正感到我們自己在看電影：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鬆了，身體也似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蓬的航船，大家跳下船，雙喜拔前篙，阿發拔後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媽聚在船尾。母親送出來吩咐「要小心」的時候，我們已經點開船，在橋石上一磕，退後幾尺，即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起兩枝槳，一枝兩人，一里一換，有說笑的，有唱的，夾着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的徑向趙村前進了。」

「兩峯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還以為船慢……。」

這一羣孩子，到達目的地後，終被老旦的出台吞去了興趣。她們撐船回去時，「月還是落，彷彿看戲也不很久的似的，而一盞趙村，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台在燈火光中，却又如初來時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坐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得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又知已經到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着，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隻大白魚背着一羣小孩子在浪花裏躍，連夜漁的幾個老漁夫，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

我引了上面幾段文字後，有這一感慨。誰說我國的文字「要不得」。魯迅的筆，不是使我們感謝我們的祖先給我們以這麼好的表現感覺的工具嗎？那像詩，像散文詩。有了這麼美麗的文字，所以然使人們起了「拉丁化」的念頭，爲着他們所知道的只是俄國化的生硬講演詞，爲着他們所能寫的只是「報告文學」之類文章的東西！至於魯迅的人，在俄日時候「漢字不死，中國必亡」，那是他的兩重人格的諸表現之一，我們留於後論。

現在說回頭來。這一羣孩子，當撐到中途時，爲着飢餓的驅迫，幹了偷羅漢豆的一宗事。魯迅先生栩栩如生地寫着那天算着的動作：

「這回想出來的。桂生，說是羅漢豆正旺盛，柴火又現成，我們可以偷一點來煮喫的。大家都贊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裏，烏油油便都結實的羅漢豆。」

「阿阿，阿發，這邊是你家的，這邊是老六一家的，我們偷那邊的呢？」雙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說。

「我們也都跳上岸。阿發一面跳，一面說道，「且慢，讓我來看一看罷。」他於是往來的摸了一回，直起身來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一聲答應，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裏，各摘了一大捧，拋入船艙中。雙喜以爲再多偷，倘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於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裏，又偷了一大捧。」

第二天，他們釣蝦時，遇見六一公公。他罵雙喜們：「你們這般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罷？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壞了不少。」

「是的，我們請客。我們當初還不要你的呢？你看，我把我的蝦嚇跑了！」雙喜說。

「六一公公看見我，便停了楫，笑道，「請客？——這是應該的。」於是對我說：「迅哥兒，昨天的戲可好麼？」」

「我點一點頭，說道：『好』。」

「『豆可中麼呢？』」

「我又點一點頭，說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來，將大姆指一翹，得意的說：『這真是大市鎮裏出來的讀過書的人纔識貨！我的豆種是粒粒挑選過來的，鄉下人不識好歹，還說我的豆比不上別人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給我們的姑奶奶嘗嘗去，……』」

對這些樸實的農民，誰不會感動？魯迅先生的感動，也許更多過他的閱者。所以。

他又在「故鄉」中，爲我們描寫閩士。別了多年的幼時朋友，當重見時，已將三十歲了。

「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夾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縐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道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枝長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這是在帝國主義和軍閥雙重壓迫下，中國農村的典型農民。他不敢用童時的稱感，招呼那喊他的人。他站住了，臉上發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老爺！……」。他和我們的作者，這麼地隔離了，所以

魯迅先生帶感慨的情緒回憶着：「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的確，早在本世紀初的閩土，是和他心目中的「假洋鬼子」們融了一重厚壁。他不知道他們是他的同情者或拯救者。他無意識地常跟趙七爺走，而不和他們站在一條戰綫。當他在補償這一損失時，他却被另一種的「假洋鬼子」所騙。後一種披着紅色大衣的「假洋鬼子」，不是給他以幸福，只是毀滅他！

被他算爲「老爺」的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地說：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我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爲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辛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辛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辛苦態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

人多了，他便成了路。」

這是當時，（三十年代初）一大羣知識分子與農民的苦悶。我們的魯迅先生，便是那一羣中的一員。他不知道五四運動，是解除他們的苦悶的呼聲，他看不出光明的前途，只剩下希望與哲學家式的語言。正為着這一原因，他在辦公桌上，他在抄古碑時，突然地會起這一感念來：「我們年青時候，也曾做過許多夢，後來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並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線牽着已逝的寂寞的時光。」這種傷感，所以然會給他以發洩的機會，是由於三十年代初的中國，不是黑漆一團的中國。因此，有了已走和他相反的路的友人在鼓勵他，在說服他。他開始不敢苟同地在心裏反抗着，並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大地醒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但這一類喪與短視，被當頭一棒喝醒了。聽他的話的朋友却自信地答道：「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改變這鐵屋的希望。」這等哲學式的有力語言，使波蘭在鐵屋中的周樹人先生變為魯迅！他追隨他的友人而「吶喊」，但也僅是帶懷疑的吶喊而已！

凡：「國〇五〇」的諸君，而謂其爲：「正心正氣」、「即天」者，亦未嘗不可。……

四 阿Q正傳

魯迅先生在「阿Q正傳的成因」中，爲他的讀者說明他寫牠的動機和怎樣寫。促他動筆的人，是孫伏園，孫氏當日在「晨報」編副刊，後來因爲要添一欄稱爲「開心話」，所以每週一次，向他索稿。他說：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過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爲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俚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不做流民，夜晚睡在破路旁屋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裏能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善於催稿，……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我就說：「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於是只得做。……終於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真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週一週挨下去，於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要假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

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得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只是我疑我倘一收束，他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存心裏，而阿Q却已經漸漸向死路上去。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於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伏園回來，阿Q已經檢斃了一個多月。……』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於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個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

像上面所說已轉譯為俄法英德日各國文字的作品，是那麼地產生的，如不是作者的自供，恐怕誰也不相信。也爲着產生是那樣的促迫，所以，如作者在成名後的自供：『近幾年「喊」有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同上）然而事情竟出意外！也許爲着這個原因，所以，從文藝立場去看，若干的結構或文字，都顯出亞契理斯（Achilles）的「脚跟」。（註）

（註）後來被魯迅罵得不堪入耳的中其今日的要人成仿吾氏，在當時的「創造季刊」（一九二四年一月）上的「吶喊的評論」中，對牠有極公平的估計：『「狂人日記」很不平凡；「阿Q正傳」的描寫雖佳，而結構極壞；「孔乙己」，「藥」，「明天」皆未免

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隨筆；「頭髮的故事」亦是隨筆體；惟「風波」與「故鄉」實不可多得的作品。」但他在後面說：「作者是中途使用白話文的一人，他用了許多無益的文言，原不足怪，然而讀下去是很使人不快的，又作者的用字不甚修潔，造句不甚優美，還有些地方艱難，這都是使作品損色的。」如指「阿Q正傳」却有些中肯。

正因爲「阿Q正傳」是在那樣環境中「擠出來」，所以，我有理由說，牠是「吶喊」中許多短篇的大聚台，先讀過那些短篇的人，對於「正傳」內的人物或動作，都不會感到陌生。可是，「正傳」也有牠的獨自特徵，所以，我們有以「阿Q」爲中心，重新估計的必要。尤其是近來關於「阿Q」的著作不算少，更值得我們作這重新估計的估計（註）。

（註）路沙編「阿Q」中有許多人的論文關涉到阿Q這一典型。

「阿Q正傳」內主要人物的生長地是我們所熟悉魯鎮，趙村的「未莊」。那裏，有統治全村命運錢趙兩府。他倆都是地主兼豪紳，但却彼此有些不和，錢大爺的大兒子，是「先前跑上城裏去進洋學堂，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到回來已失去辮子的「假洋鬼子」。趙大爺的兒子是秀才，但却不是百分之百的保皇黨，必需時也可以加入「自由黨」。這兩家地主家裏的情況，以趙府（作者也只說到他）爲例，是如此：除了應有的太太及少奶奶之外，當老爺感到必需時，不願結髮之妻是否「兩天沒有喫飯」，而「要買一個小的」，但這是老爺認爲有用而做費，對於下面的女僕或短工，却連燈油也珍惜。定例晚飯早，不准燃燈，偶然的

例外：「其一，是趙大爺未進秀才的時候（註），准其點燈讀文章；其二，便是阿Q來做短工的時候，准其點燈舂米。」全村的住民，對於他們的尊敬，是無需說的，而他們感到覺悟定的秩序有些動搖時，也會退了一步，尤其是在亂世，對於盜賊的畏懼，怕要結怨，不肯相迫太甚。在他們自感到統治的秩序是井然時，便可發揚威風，傳揚個個威嚴的，是該莊的地保。

「阿（註）依「正傳」所述，只有「趙大爺的兒子進了一秀才」，沒有說他本人也是秀才。這裏（如改爲「其一，是少爺未進秀才的時候，他似乎較安些」）。

大其「珠莊」試他的人，在趙錢兩府之下，而高於別人之上的，應該是趙司晨和趙白眼。他是秀才的「真本家」，各有母親，但作者告訴我們，趙司晨却多了妻和妹。這兩個人，似乎自耕農，且是富農，但難於肯定，因為作者沒有詳細的告白。

還有的人，難於分別他們或她們的經濟狀況。也許都差不多。鄭七嫂，是常走趙顯的，女人，她有一個女兒。王鬍與小D都是貧窮到以「短工」爲生。無需說，「正傳」的主人，就是其中的一個競爭者。

「未莊」有若干店舖，作者並不注意牠，他只說出一家酒店。店舖是否咸享，繫於穩定，但牠和一般酒店同有堂倌和掌櫃。那些短工們常是牠的「酒客」。也無需說，牠又是鄉村輿論的製造所。

莊內尚有兩個公共的地方。第一是土穀祠，有一個老頭子看管牠，這是鄉村赤貧者的家。第二個是靜修庵，裏面有大小尼姑，並有一皇帝萬歲萬壽的「龍牌」。

但是，上面的人物，都不是主角。牠的主人公是「阿Q」。他的姓氏和他的大名一樣，不易確定，但他的職業却十分明白。——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他的工作情況，有一老頭子會這樣頌揚他：「阿Q真能做！」他沒有家，如果說有，那就是土穀祠。他有自尊心，但可惜他的腦皮上，他有幾處起了癩瘡疤。因此，他十分忌諱着和牠相近的話，如「光」，「亮」，「燈」和「砲」。他的自尊心，也許由於「先前」比依闊得多」，他的眼睛裏由之沒有未莊的居民。他還自負，這也許由於他的愚蠢，並鄙薄城裏的人。「譬如用三尺長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裏却加上切細的絲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莊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鄉下人呵，他們沒有見過城裏的煎魚。」

正合於俗諺所說：「人窮志短」，我們的阿Q儘管眼睛高和自負，而為着窮，他不能不受社會上公認高於他的人們的侮辱。就未莊而言，唯一能合理侮辱他的人，是錢趙兩府。「正傳」的作者告訴我們：首先侮辱他的，是有秀才的兒子的趙大爺。受侮辱的罪狀，是「正喝了兩碗黃酒」的他，敢說趙大爺是他們本家，而且敢誇口：「細細排起來，他還比秀

才長三歲」。罪的責罰，是地保傳他到趙府去，他被打了嘴巴，領回這一判司。『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至於錢府呢？那「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平常光罵他的癩瘡疤頭。他能够反抗呢？當時社會的慣習不許他。於是，他有被壓迫者神侮辱者的共同表現：心頭的補償。每度他在償還了被壓迫和被侮辱的債後，他還循補償作目的規律，『不到十秒鐘』，便『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如果他在想：『我總算是被兒子打了！』那他也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況也不是「第一個」麼？「你算是什麼東西！』

又正像一般「自輕自賤」者，在慣受侮辱和壓迫下，對於壓迫他的人，侮辱他的人，不僅沒有反抗的意識，而祇有訴諸「精神上的勝利」。『每逢揪住他黃辮子的時候』，『兩隻手』『捏住了自己的辮根。歪着頭，說道：「打蟲多，好不好？我是虫豸——還不放麼？』若使未得對方的寬恕，他就『碰了五六個響頭。』

當一個人失去了自尊心，並且還淪落到這一境地時，必然地要進一步自暴自棄。因此，阿Q也有了嗜好。牠就是喝酒和賭博。儘管他對於不及於他的人們，偶然的掀起了久壓在心頭的被侮辱和被壓迫的情緒，但由於壓伏得過久，他不是增強反抗力，而是欺侮他認為可以欺侮的人們，那些人除了小D，就是未莊的小尼姑。他欺侮後一種人，爲着她比他還缺乏反抗力，是公然的。他敢在酒店前，調戲她，摩着她新剃的頭皮說：

沈某請增韞拆卸滿旗下滿城，編入漢籍宣告獨立，以免戰爭，增韞不允。十四日下午，召集官商會議於撫署，請增韞贊成獨立，仍不允。至晚八時，尙未定局。過午夜二時後，城南北的新軍八十一八十二兩標，與由滬來杭之敢死隊聯合，直攻巡撫門，連擲炸彈，署衙遂焚，衛隊巡警消防隊等隊一律歸順，統改編爲民軍，宣告克復。隨佔軍械局，及據大清銀行及藩運各庫，防營亦降，增韞與總督均被拘禁。設軍政府於諮議局，出示安民。……各府縣亦次第傳檄而定。

○頁。

讀完這一段，對於「正傳」第七章及第八章，會更加明白。

由於舊社會開始崩潰，趙爾巽府。便暫失去過去的光輪。不僅遠在末莊的他倆，就是城裏的「舉人老爺」，對這似乎突然而來的浪潮，也感到恐懼，把重要的東西，裝在箱子內寄藏趙府。但這也不是安全的所在，終被人們劫搶了。

在這樣轉變的時代中，阿Q呢？他像當時一般的農民，雖然早聽到「革命黨」這一句話，甚至進城時已親見過殺掉革命黨人，而他却不是被殺的同儕者。他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爲難，」「一嚮是深惡而痛絕之」。但當知道「舉人老爺」懼怕牠時，和目擊末莊「羣烏男女的慌張」時，他却未免有些神往和快意了，他在心裏想着：「革命也好罷。革這夥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可惜，他只這眼

想，甚至還做過一次「革命」的夢，他並沒有「投降」誰，也沒有革了誰。當他爲了肚子饑，和從靜修庵走到老尼姑廟時，他纔發現趙秀才和假洋鬼子已動手「革」了「革」了「革」了。同時，他還知道驚怕「造反」與「革命」的人，已加入「柿油黨」，他還看見他倆大襟上掛着革命徽章的「銀桃子」，他立即感悟：「要革命，單說投降是不行的；盤子辦子，也不行了了，第一着仍然要革命黨去結識。」但「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黨只有兩個，城裏的一個早已「被」的殺掉了，現在只剩了一個假洋鬼子。」怎麼辦呢，他「除趕緊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沒有別的道路了。」於是，他走進假洋鬼子的家。可惜，假洋鬼子看不起他，並且「不准他革命」。

他似乎被拋入茫茫的大海中。他失去最後掙扎的勇氣。他只有在土殿祠內頹喪。但命運之神却正追踪着他。他於是被當爲搶犯而關在牢中。革命的「把總」，對這種案件，忽然非常生氣。曾在「幫辦民政的職務的」舉人老爺面前「拍案打凳的說道：「懲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黨還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全不破案，我的通子在那里？」這一決心，使阿Q演了「大團圓」的一幕，最後的一幕。

爲什麼，魯迅先生要使阿Q演了這最後的一幕戲，我們在本節開始時候已經介紹他的自供了。就二十年代的事實說來，這是許多現象之一，似乎不足爲奇。把總當舉人，充當革命政府的首領，秀才與假洋鬼子共授「柿油黨」，而應該革命的阿Q，却在這找覓革命的指導者

。革命當是爲人民謀幸福的，但那時候的人民（阿Q），却敬而遠之。這就是全部辛亥革命戲劇的要點，魯迅先生用諷刺的筆調，在「阿Q正傳」中爲他揭示出來。無需說，這一典型的人，到三十年代——一九二七年時，已經化爲枯骨了。如果說，他尚有幽靈，再重現一次，那不是未莊的貧農，穿破衫破褲的阿Q，而是一大羣遷葬外族訓令而行動的「假洋鬼子」。至於「阿Q正傳」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一個。

★

★

★

★

我們不從「正傳」的文學方面，再作何種的重述——關於結構等等，在前節及本節開始已經說過了。我們尙要敘述的一個問題，是成爲典型的阿Q對於中國國民性的關係。一大批魯迅的崇拜者說，阿Q並未「斷子絕孫」，他還存在於每個中國人的靈魂裏。我對於這一武斷，提出抗議。因爲這是對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中國青年——不，全體國民的侮辱。誰敢說，正用血和肉記錄近一個世紀來所未有的偉大行動的我們，靈魂裏尚有阿Q主義的成分？

我由這一抗議，記起一個有意義的對比來。過去我們不只一次聽到：阿Q就是唐，吉訶德（Don Quixote）。如果這對比是正確——應該說一些也不正確——那我們可以承認，在我民族的精神中，有了唐。吉訶德的成分。我們的承認，不是「自卑自賤」，是感覺驕傲，可是我們決不承認：中華民族的國民性是阿Q式的。我們應該知道：作這一估斷的人，都是帝國主義老爺派來中國的政治教師。

爲着說明牠，容我們把這兩個文學史中成功的典型人物——「唐·吉訶德與「阿Q」——作個對比。

說到「唐·吉訶德」，我們應該讓俄國大文豪杜格涅夫來開口。在一八六〇年正月十日，援助貧文士和學者協會，杜氏曾作過一次公開的演講。牠的標題，是「哈孟雷特與唐·吉訶德」。在這一篇爲文學史增色的論文中，他爲我們指出——西提斯的唐·吉訶德和沙士比亞的哈孟雷特，是兩個人性的表現。前者是「自我犧牲」，後者是「自私自利」。他又爲我們指出：「唐·吉訶德自身所表現的，……第一是他的信仰；對於有些永久的，不可變的事物的信仰——要而言之，是對於真理的信仰。」由這一論斷出發，他如此公式地說：

「唐·吉訶德的對於一個理想的歸依心，是再強也沒有了，爲求這理想的實現，他就是任何可能的難行苦節，也有所不辭，就是生命也可以犧牲的。他的寶貴自己的生命，只在這生命是實現理想的手段，是將其理和正義來樹植於人間的手段範圍以內，除此以外！他對自己的生命也毫無重視的必要的。你們或且要反駁我說，他的理想，是以他的狂亂的想像力從各騎士小說的幻想世界裏得來的，這一點我當然可以承認——並且，唐·吉訶德式的性格的滑稽可笑也正是在此一點。但是無論怎樣，理想終究是理想，理想這一個東西本身的健全潔白，却是毫無問題的。只爲自己一個人而生活，只爲了自己一個人而經營的生活，由唐·吉訶德看來是最無聊最可恥的事情。他是完全在己身以外（我們若可以這樣說的時候）——爲

己身與那尊帶而生活着，爲了別人，爲了團體，總把「惡」字剷除。他是對人極大的敬的。惡勢力在作惡。對那些魔鬼，那些巨大的惡靈，就是那類型的感佩者在作惡。他沒有一點兒爲我爭議的痕跡，他對已身的事情，一點兒也不想到，他完全全的可以說是一「自己犧牲」。請大家注意於這一個字！——他只曉得信仰，他的信仰是確然不動沒有思前慮後的猶疑的。所以他又是大胆無畏，堅忍不拔，而以最粗薄的食料與最儉樸的衣飾自甘。他實在沒有閒工夫計及到這其衣食的瑣事上去。他本心是柔和的，但精神是偉大勇敢的。他的柔美易感之善良，却不妨礙他的勇猛的自由，因爲他竟沒有功名心，所以他對他本身，對他自任的天職，他對他自己的體力，也並沒有疑念。……他沒有多少智識，但他並不需要這些過多的智識，他曉得他所努力的是什麼事情，他曉得他爲什麼要在那這世上來；這就夠了，這在他是最重要之智識。唐·吉訶德也許是一個完全愚蠢的人，因爲最確實的現實，在他的眼前，會同蜜蜂在他的熱心之火前一樣地溶化消失。在他的眼裏，木製的人兒會變成真正活的慕爾人，牝羊會變成騎士；也許是像一個無知無覺的人，因爲他不能和他的直覺一樣容易的成。但是他像一株堅牢的大樹，在地下有着深根，決不至於對他的確信有着不忠實的地方。也不至於將他的目標隨意更換的。一身的堅強的道德力的貫透（諸君請注意，這一位淳子似的者進行的騎士，却是世界上位最有道德的人呀！）却給與他的一切判斷，一切言說，及他的人格以一種特異的力量與偉大，不管他是如何的滑稽可笑，是如何的帶滑稽在卑

偏僻窮地之中，但這德給他的力量與偉大是傲然存在的。……唐·吉訶德是「理想」的忠僕，是一位大熱情家，所以他也常被這「理想」的光華所點耀輝映而保存着榮光。」（註）

（註）引自郁建夫讀「幾個偉大的作家」。我這裏引用這麼冗長的文句，不僅爲着他的一切值得我去引，而且爲着便於未讀過這一偉大作品的讀者們的便利。「唐·吉訶德」我國有兩個記本，第一是林紓譯的「魔俠」，第二是傅東華的全譯，都是商務出版。試問魯迅的阿Q呢？既沒有什麼永久的信仰，更談不上有什麼「理想」。他的愚蠢，他的無知，他的卑劣，他的一切，沒有一個地方，值得說是光明的。他像掉在糞堆裏的蛆，他的每一毛孔，都充塞着污臭。那麼，尊敬的閱者們，魯迅的阿Q有資格和西萬提斯的唐·吉訶德對比嗎？一個是上帝，一個是魔鬼呵！

也許人們會說：阿Q值得我們同情的。還有人們拉出大題目說：阿Q是「道地的黃帝子孫」（註）。自然，人們對於被侮辱者被壓迫者都會同情的，但同情的理由，不在於爲着他是黃帝的子孫。我這裏不是在討論，我們應當同情誰，我是說，像阿Q這一典型，在今日不能認爲我們的「同胞」，甚至我們還把阿Q的行爲，認爲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註）路沙編「阿Q」八五頁。

早在一九二七年，已有「左翼」的文藝批評家說，「已死了阿Q」，說那時代是阿Q已死的時代，這是正確的，這是我們的振奮國民精神所應知道的，但到一九四〇年，還有一大

批自稱為「前進」的人們，發現阿Q是我們的國民精神的表現。天嘯！誰曉得說出這些話的人，是否「道地的黃帝子孫」呢！

爲着上述的理由，所以我說，我們可以自認——若使是有這自認的必要——是唐。吉訶德，但我們決否認是阿Q。若使有外國人問我們：貴國有沒有阿Q這個人呢？我們不猶豫的回答道：有的，先生，但可惜他已死於一九一一年，而且他是「斷子絕孫」。若使對方還問我們：阿Q有沒有旁枝的承嗣的後代呢？那我們可以這樣地答道：也許有。但那種人的衣服是染着「紅色」的！

在這裏還會運出一個問題來，何以西萬提斯與魯迅，創出這麼相反的人物呢？這是否由於兩個不同的時代——一個是十七世紀，一個是二十世紀呢？也許是，但這不成爲主要的理由。一個文學家；正似一個思想家，他是有靈魂的，他是有獨立的人格胸。儘管說：他的作品，是映現「善」與「惡」的鏡子，但他總適應他的靈魂，洩露出光明來，至於那醜惡只是光明的陪襯。雖然西萬提斯的一生，是可悲，但他却不因貧苦而售賣上帝給他的靈魂。因此，他目擊一羣騎士——他本人尚是一個在地中海對土耳其人戰爭的兵士——的唐。吉訶德式行爲，他却不能使他的唐。吉訶德寫成阿Q。魯迅呢？他恰恰和西萬提斯相反。雖然說，辛亥前後中國的政治舞台，充滿着「把總」與「舉人老爺」嚴封橫行着「趙大爺」，但由於魯迅在北京長期官僚的生活，使他忘却人類光明的一面。儘管他的「阿Q正傳」不是有計劃

的作品，但他的生活却決定他的創作，他只能如此想，如此寫。我們要承認，他在北京聽見他所做的，本也就是如此。我說到這裏，恨不能使魯迅從墳中走出來，教他再讀他生時所喜讀的尼采假蘇普支之口所說的話！

「一切存在者至今皆創造了超過自己的東西；你們願爲這大波濤他退潮，甯願退到禽獸而不願超過人嗎？」

「猿猴於人類是什麼？可笑的對象或痛苦的羞辱。人於猿人亦復如是：可笑的對象或痛苦的羞辱。」

「你們從爬虫進到人類，你們內裏許多地方還有爬虫。有個時期你們是猿猴，但至今人比任何猿猴還仍其爲猿猴。……看呵，我教示你們超人。」

五 不准革命

靠着「吶喊」，周樹人先生變爲人們共知的魯迅。他就用這一個名字，走進各大學充當講師。如果說，在教書館內，「僉事」不值得什麼，而漸進文學黨却有若干青年的「崇拜」。現在，他不是被錢太爺侮辱的阿Q，而將是屢喊「革他媽媽的命」的革命者了。驅迫他一步一步向他所不知道的目標走去，它是什麼呢？也許有很多。但女師大的事件，却是其中重要的一個。

雖然到一九二六年他曾因教長易爲易培基而恢復原職，但他已不帶那不算「顯區」的官了。他如不像一匹走入溪山的猛虎，他總不算是被關在萬不可破的「鐵籠」內的人。他一面攻擊「正人君子」，另一面確在罵他爲「土匪」的人們的眼中，展開了眼睛，看他所縱看的，張開他的大口，說他所能說的所應說的。

這是什麼一個時代呢？

入關的張作霖爲着郭松齡的倒戈，而引起奉系在國內勢力的瓦解；長江流域，大半落在暴發戶孫傳芳的手裏；直系的首領吳佩孚尙擁有兵權；國民軍首領馮玉祥，則請段執政開去本兼各職。這是魯迅周圍的政治現象。還在南方的廣東，雖然已失去大元帥，却因東征的勝利，奠定了國民政府的基石，並將着手北伐。被南方革命朝氣所吞攝的帝國主義，把他的餘威向北廷去發洩。當年三月十日領袖荷使代表十二國向執政府抗議封鎖天津海口，十二日駐本國駐滬總領事停止開砲。十六日同荷使代表辛丑和約八國，以限四十八小時答覆由袁總統囑寄送交該府的外交部，並聲明如無完滿答覆，天津的各國海軍則用武力解決。十七日北京各團體代表向執政府請願：拒絕八國的要求，被該府衝隊毆傷多人。這是大風暴的信號。翌日各團體請願，遂產生所謂「三一八慘案」。這一層殺，引起魯迅的憤怒，他不是一句或「而是怒吼了」。

「最爲的說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無花的蔷薇」。

「血債必須用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同上）

正因爲他有這一勇氣，遂成爲執政府狩獵的對象。他不得不避入日本人所設的山本醫院，後來又遷避德國醫院，法國醫院。直到五月方敢回寓，但北京雖好，終非久居之所（他被通緝五十位教授之一）。他遂於八月二十六日離開這可詛咒的地方。

依「魯迅批判」作者李長之考證，他的出京，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景宋「景宋是『兩地書』的主人公。她這時候，尙是女師大的學生。她和他通信。大概在免職那一年三月。她是這麼一個女性：『剛率十二萬分的人』，『無日不被人斥爲驕傲與玩世不恭』，『生來懶惰，難與人同』，『加以先人稟性豪直……不免粗獷』。（『兩地書』）但這位南國的佳人，却過着一個超過『不惑』的才子。

魯迅南下，它往何處去？依他說：『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得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京派和海派』）他既不爲官，應更不爲利。他自然而然地，不能就移居上海了。他和景宋在上海分手。一個應廈門大學的聘，另一個則回返原籍——廣東。

九月四日他踏入廈門新的環境，使他的心靈更加不安。首先是校內的派別多，互相擠軋。他感嘆地告景宋：『論學校，就如一部『三國演義』，你槍我劍，好容易煞人。』（『兩地書』）。他又不滿于國學院內教員的『淺薄』，告景宋道：『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淺薄之多』。

。他們面目倒漂亮，而語言無味。」（同時），還有他所憎恨之「正人君子」的「現代派」在他眼前，使他感覺難於應付。怎麼辦呢？他一離開了「羣衆」，慣性又復發生。軸支配他，使他正現周樹人的原形。他消極了。他告景宋：「現在是方針要改變了，地方也不尋，書也不編，文稿也不看，也不燒，回信也不寫，關戶大吉，自己看書，鼓鑼，睡覺。」（「兩地書」）儘管有一個人回信說：「不要太認真。況且你敢說天下就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永久的朋友？有一個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個人而推及二三以至無窮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總之，現在是還有一個人勸你。」（同上）但這却不能使他安心在厦大，他在該年末，終辭去教職。

這是一九二六年末。在這一年，北伐軍已攻取武漢和九江，並將到滬江浙。革命的情緒，使周樹人又變為魯迅。他在「次」厦大演說，曾告訴景宋：「此地北伐順利的消息也甚多，極快人意。」如果北伐的消息，會給他那麼感動，我們就不難明白，他離厦大後，何以會答應廣州中山大學——如果不說還有一個人勸誘他——的聘了。當他任該校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時，他已結束了四十六歲的生涯。

他前往廣州幹什麼呢？辦教育嗎？這不是他的興趣；做官嗎？他已厭倦了他。依他告訴景宋：他「到廣州後，對於紳士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再向舊社會進攻。」（「兩地書」）後一個「野心」，當時是否有

，我們曾不管牠。但一就了職，張目四顧，他有些發徨了。雖然教務的生活（他對牠在「三間集」有冗長的敘述）分了他的心，他似乎不忘记本行「文藝」。他於二月間（一九二二）曾在香港演講「無聲的中國」，為他的聽者指出中國文學的路線，只有兩條：「一是抱着故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文而生存。」至於廣州的青年，有些則請他寫文章，或要他編刊物。這個似乎凱旋的「老人」——如果這兩字是用得對——相當地滿足於他的處境。雖然火山的岩漿已開始流動，他却似「蓬塔論末日」中所描寫的人物，正縱目觀看革命的熱鬧，並被邀到黃埔軍官學校去演講（四月廿四）。他用「革命時代的文學」，他對那些軍官候補生說：「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並為他們指出：「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最後，他做了這個結論：「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砲就把孫傳芳驅走了。」

我們要知道，當革命高潮掀起時，魯迅在北京開始「吶喊」；當北伐軍出發時，他在那故鄉中「彷徨」；到他足踏「革命發源地」，歷史已翻過了一頁。他終有一天知道牠。知道後，他無法再住在「大鐘樓」內，向中山大學辭職。「年譜」告訴我們辭職原由，是「為救被捕學生無效」。辭職後的他，並未馬上離開廣州。他要目擊另一幕——他的處境，表現於「而已集」的，似乎雖有一個人人在安慰他，並不感到快樂。這一危境，迫他於當年九月末離粵，十月初抵達「海派」的根據地，「年譜」告訴我們：「八日移居雲里二十三號與許廣平」

同居。」許女士，就是他的學生，他的一個安慰者，他的「小鬼」——景宋。

四十七歲的文人纔受叩彼德（Carré）的一箭，也許會被人們視為古今中外的奇事吧！但在文學史中，却不是記錄的創造者。李凡世經法國文學家馬蒙泰爾（Marmontel）墮入情網的時間，却在他五十四歲的一年。所不同的，在馬氏的「回憶錄」中，非常感謝他的年輕貌美的妻，而魯迅在「雜感」內，却吝惜給她的一個報酬。他的生活，尚不是靠版稅，而是靠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黎元洪的看顧。他受任為特約著作員，這一宗事，他也許「恥」於說出牠，但「年譜」却記着牠。

正像和過去對抗「正人君子」的「現代派」，現在他也需對抗新的敵人。那就是以創造社為中心久據上海文壇的一羣「革命文學家」。雙方交戰的動機是什麼，我們還不明白。其主要的理由，大概是兩雄不並立。如果我們不能識「京派」的大師和「海派」的引領，雖站在同一的戰線，那麼，誰也難於解釋為什麼創造社這羣文人會圍剿他。

早在一九二四年，成仿吾已對「吶喊」作過不公平的批評（見前節），但那時「吶喊」者還在北平。現在親臨上海了，被攻擊的人，不能無抵抗。被圍剿的人，不能不反攻。這是每個讀「三閒集」的人的一個感覺。

依他在該集的「序言」所說，當他「到了上海，却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這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

或幾位先生們，那時的文字裏，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至於青年呢？他感慨地接着說：『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白云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裏的盧君，也終於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爲什麼「圍剿者」有這一力量，或有這一影響呢？在這裏，我不能多說創造社和他轉變後指導者——中國共產黨的作用（請參閱拙作「由文學革命到草文學的命」），但爲着便於閱者理解起見，我應說下面的話，創造社本來是標榜爲藝術而藝術的，後來受革命高潮的推動，由浪漫主義的園地，被擠上政治的舞臺，到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們這一羣人，受當時日本思想界的影響，適應自己的轉變，高喊出「文學革命」轉入「革命文學」。什麼「布爾喬亞」，「普羅列塔利亞」等名詞，都在這期間輸入。他們的「洪水」已經退潮了，換了「文化批評」——後來改爲「思想」，他們的轉變，是遵循中共的指示，因此，他們的文藝政策，是唯中共「文總」之命是從。我們由那麼狂熱的論戰看去，至少可如此地說！中共的中央並未曾認爲「圍剿」魯迅的不合理。正因爲有這一承認或默認，所以，受中共影響的當時青年，必然地左袒那魯迅的反對者。

可惜，我沒有「文化批評」之類的刊物，我只能由「三閒集」及記憶敘述這次論戰的大略。

先說開劇的陣容，魯迅在答徐勻的信中如此地告訴我們：「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但向他們屁股後面望過去，則有戎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文化批評』，『流沙』，蔣光X（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字）拜帥（註）的『太陽』，王獨清領導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士靈』；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連續的『洪荒』。但前幾天看見K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線』七月號），纔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的。」（『三閒集』十三三頁）。

（註）是指「鳴綠江上」的作者蔣光赤，當魯迅對抗他時，他改爲蔣光慈。是當日中共的「文學家」。

「開劇」者是用何理由呢？他們指魯迅爲「封建餘孽」，爲「有閒階級」。對他的名著「阿Q正傳」，狠毒地用「死去了的阿Q時代」（錢杏村）給與一個估評。成仿吾只肯定地說：魯迅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因此，「我們的魯迅先生坐『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而馮乃超却中傷他生長於紹興，指爲『醉眼陶然』，並說他「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錢杏村似乎中肯地說：「現在的時代不是陰險刻毒的文藝表現所能抓住的時代，現在的時代不是纖巧俏皮的作家的筆所能表現的時代，現在的時代不是沒有政治思想的作家所能表現的時代。」不管這些批評是否有理由或正確，

而掛着革命掛子的他們，以馬克思列寧的祖師，擁着「無產階級祖國」的實力，和中共在當日羣衆中的威望，就是沒有理由，青年也肯伸長耳朵，聽他們的話。

魯迅對他們的攻擊，自然也不肯和氣地應戰。他也痛罵他，怎樣罵，我不再引錄了。因爲現在的青年可是創造社們的讀者，已是魯迅的崇拜者。十多數幾乎每個都讀過他的著作。但我却要問，魯迅在這時候的理論武器是怎麼呢？他雖然有的地方仍護「文學研究會」不「離開人生說藝術」，但他却守下面的根本觀點：

「我們如果承認藝術有獨立的無限的價值，藝術家有完全藝術本身爲終目的之必要，那末我們便不能而且也不應該撥開藝術價值去指摘藝術家的態度。這和拿藝術家的現實行爲去評斷他的藝術作品者一樣可笑。……我們平常譏嘲一個人，還須觀察到他的深處，又拋棄了藝術價值得浮薄可鄙。至於拿了自己的似是而非的標準，既沒看到他的深處，又拋棄了藝術價值，便無的放矢地攻訐一個忠於藝術的人，真的糊塗究竟是別有用意？這不過使我們覺到此刻現在的中國文藝界真不值一談，因爲此批判成名而又創造白話的所謂文藝家者，還是這樣地崇奉功利主義呵！」（同上八二至八三頁）。

魯迅上面的回答，是帶着非常溫和的態度，而且內心中所潛伏的悲哀，也隱隱尖流露出來。我讀了牠，有這一感覺：由廈門而廣州，他心裏的敵人，是北政府的官僚，和受他們保護的「正人君子」——是否受保護，我不敢肯定——所以，希望與創造社結成同一「戰線」

，誰知講了空，而且自己也不安於位。現在到上海來，正像阿Q走入「假洋鬼子」之門；自前是「革命他媽媽的命」，而我們的「革命者」，又「不准革命」。比這更壞的，還動員數路人馬圍剿他，他能喘不喘地嘆口氣嗎？他所說：「無的放矢地攻刺一個忠於藝術的人」，就是這情緒的洩露。

我們暫不說圍剿者的理論，是否高過被圍剿者，魯迅對於他們，確是客氣些。這也許「馬克思主義」與的「蘇聯」的金字牌子，使他不能不如此。同時，對於對方的攻擊，也只是招架，並不想給與攻擊者以致命的打擊，而且還可以退若干步，承認李克農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自供：「用於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三閒集」八九頁。）這一種態度，是兩個原因的結果。第一、魯迅本不想和他們論爭，並且反為「投降革命黨」而來。第二、他究竟是「阿Q」的製造者，不會和阿Q一樣，「假洋鬼子」不准革命，就走到土穀祠內蒙被而睡。因此，他一面，為自衛而反攻，另一面於反攻的詞句中，表示自己投降的存心。為什麼他要如此呢？只一句話：他只能如此。我們早說過：魯迅有兩重人格，當他被壓迫時，內心潛伏着反抗，但在反抗中又有世故人情教乖他的顧慮。他一生沿這一比世原則所指示的路走。至於應該光明的多還是黑暗的多，那要看周樹人與魯迅兩個人的面貌。這一次成仿季初梨的鬥爭，他就用這個原則。他知道對方優點是「革命」的「祖國」，她，魯中天子日，他不敢正視，但他明白，「革命黨」是不會拒絕投降的，成與季們的動彈

「祖國」的政策不會永久批准，他只要耐心等待就够了。他又知道，對方有一弱點，是缺乏文藝的本能，只有一塊牌子。而他自己既敢罵他們是「瞎瞞」，那自然要照準這亞契奧斯的脚跟而攻擊，這個攻擊，不管是否中的，而却足引起「祖國」政策執行者中高明人們的注意。無需說，有了這個注意，他的「投降」就會成功了。

爲什麼說圖窮者有弱點呢？我們要明白：這時候是中共開始自殺的階段。老的幹部將逐一被擠走，新的黨員不管在那一工作部門都不會有一個立足地。這不是死亡就是離開牠，剩下來的是赤色的官僚。在文化方面，當然也是如此，雖然有幾個人帶着老牌子，但除了牠，一些新貨色也沒有。這正像魯迅在「吶喊」中假九斤老太之口所說的：「一代不如一代」。這不是我們的冤枉，可引魯迅的話來反證：

「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似乎工作別論。招牌是掛了，却只在吹噓圓影的文章，而對於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或則將劇本的動作辭句都推到演員的「昨日文學家」身上去。那麼，剩下來的是惡劣的內容，一定是很革命了罷？我給你兩句馮乃超的劇本的結束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兪兒：我們再反抗去！」（同上九〇頁）

不僅那時的普羅文學家，有上述「拙劣」的東西，就在現在吧，沒有一個人能說「新華

日報」上的文字會比「野雉」與「儂兒」的句子，更加高明。但這有什麼關係，甚麼文學在他們看來，有了「野雉」與「儂兒」為國志，有了「不怕」與「反抗」的呼喊就是夠了！

現在話再說得遠來。在那樣的論爭中，不會有任何結果，我們可以料想到。魯迅本人更有這一感覺。所以，他說：「橫野極不濟，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裏積蓄「十萬兩無烟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同上六七頁）

話雖這樣說，但魯迅的個性，卻不會在他的心裏忘却了牠。所以到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時，還在指摘創造社中的王獨清，郭沫若，自然不會忘却成仿吾。他帶卑視的眼光，輕蔑的口氣告訴他的聽衆：「據日本雜誌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農工大衆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選了沒有。」

此外，他尚對「正人君子」的論調，他攻擊徐志摩等的「新月社」，同時又攻擊梁實秋。我們可以如此說：魯迅對於這一派人，是一些不容氣的。

現在，容我做一不是結論的結論。困在核心中的魯迅，經過大戰之後，他自感不能不作進一步的研究。他就是我在後面所說，他着手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書籍。同時，他果於等待到成果，他加入中共的文藝團體。這是魯迅生活另一頁的開始，自然需要給他以新的

一節的篇幅。

六 浪子之王

我們可有這一認識：當創造社起來吶喊時，魯迅尚關在「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裏；當創造社由吶喊進而搖旗時，魯迅方敢「嚷起來」，但却仍徬徨。當創造社吶喊搖旗奔馳於市街於政治舞台時，魯迅却只能諷刺遺少和「植油黨」；當創造社結束其浪漫主義的歷史運動，另負一簣艱時，魯迅方敢對「要革命，單說投降，是不行的；盤主辯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黨去結識，但「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這是梅樹不同時代的吶喊。聰明的魯迅，在被人們痛罵後，明白，他不能不鍛鍊對抗的武器，這就是所謂唯物史觀。於是，他不再校輯輯康集，他老當益壯地改換讀着的圍地。看他的自供：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一拚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糊塗不清的疑問。並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糾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稍進化論的偏頗。」（『三閑集』序言）

這自供是寫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夜，也就是寫於他開始了自我否定之後。到了四本年代方讀蒲力汗諾夫的一本書，我們雖然不能說他不是不投遞，但似乎他的「左傾」的理論變遷，已落在當時一般「前進」的青年之後。但這是沒有關係的。在阿Q的國度裏，人都是

否落後，是用他能不能爲某一政派所崇奉的「祖國」辯護或服役，而不是用他的智力去所以，到當時的青年已讀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後，方在倫敦圖書館譯看了該主義ABC兩著作的鄒軀奮，還有膽量在青年面前印他的似讀書筆記之類的東西。自然，問題也許不在於讀書的先後，而在於他的理解。到今日已被宣傳爲萬能的魯迅先生，誰也不能在他的崇拜者的面前，提起他曾不懂得他所讀的，但在四十年代初我們却有這一疑問的權利。

魯迅早在一九二八年，自己會對叫做愷良的人說：「我對於唯物史觀是門外漢，不能說什麼。」可是，到譯完了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他就自信是入門者，可以說了什麼。使我們十分有趣地感到的，他對於這一門的智識，總未曾開過大口。這只是證明上面的論述，魯迅對於唯物史觀還是陌生。因爲，要明白牠，要有經濟學，哲學等基礎。正像高爾基自稱：「我是一個蹩腳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的魯迅先生也永久是唯物史觀的「門外漢」。

依「年譜」的記載，魯迅在這時候，於譯刊「山水人物」，創辦「奔流」（一九二八）之外，還和王方仁等辦「朝花社」譯刊盧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和「文藝與批判」（一九二九年）。到編「萌芽」時，他已五十歲了。「萌芽」出版於一九三〇年一月，這是他自我否定的信號，所以於當年二月，他簽名於「自由大同盟」，於三月加入中共的文藝團體「左翼作家聯盟」。現在，「不准革命」的時代過去了，他也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在這裏，我們要說兩宗事：當日的社會情況和魯迅之兩重人格的作用。

事。比例產業的落後，當日知識分子文化水平的低下，是無需說的。但他們的致命傷痕，却在於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盲目。雖然「五四運動」的客觀任務，是建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而這一目標，在他們的進行工作中，却忽然地忘却了。受別民族歷史的刺激，拾取了別人的旗幟；不自覺地，轉了灣兒，迷了正路。他們就這樣地進入牛角尖的深處。

爲什麼，他們會這樣地走入迷途？這是社會發展中必有的一舉。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不平等條約束縛下的中國，如果一天不解除鐵鍊，一定有三多：第一和第二是破產農村的農民，化身的「兵」和「匪」，第三是知識份子的相對過剩。前兩者成爲軍閥時代所不可缺的工兵，後者則他倆的領導者。這三種人一混合起來，所演的更劇，不是喜劇，而是扯着時代前進輪子的悲劇。應有如此的理解：在上述社會環境中，若使知識份子能够認識自己國家歷史的前途，那會促進悲劇的收場。因爲，在他們的領導下。可把破產的農民，充當軍閥的唱聲歌者。五四運動的歷史之一任務，就知識份子說來，應該是如此。但如我前節所說的，到後來他們却忘却了牠，而轉入另一階段——謬誤的階段。他們的主觀，也許有這個錯覺：帝國主義固然應該「打倒」——這一點他們是一些未曾對他讓步的。上負着打倒工作的農民與城市的工人，如不能在進行其偉大工作中得到報酬，便大失「革命」的所期。他們由這一倫理出發，產生這一結論：爲着革命大眾的利益——這本就是革命者的主觀使命——應執兩把利劍，一面砍倒外來的敵人，另一面也應付內在的必須砍倒者。他們怎有這一力量呢？這一點，在當時

，他們並未加以深思遠慮的估計，但他有近於哲學家式的思考，爲着十月革命的結果及其結果的存在，資本主義整個體系必然沒落，中國的一環怎能不隨母體之死亡而流產呢？於是，他們雖然感覺自己的力量有限，而下意識却有鼓勵他們之外助的實力無窮。爲着這，他們在那時期，就像唐·吉訶德似的，成爲革命的遊歷的騎士。的確演了若干把風車視爲魔鬼的笑劇。

然而，這是一九二七年初期的局面，笑劇的發展，失去調查內在矛盾與解除帝國主義鎖鍊的歷史機會，變成國內無出路的鬥爭。鬥爭既然沒有歷史的前途，其結果被指定經常地扮演悲劇主角的工人與農民，也厭倦這鬥爭，逐漸地退到幕後去。但知識份子，却要增加鬥爭的火力。這就是「八七會議」後的許多愚蠢行爲。開始之時，也許這些知識分子中，主觀上尙是純潔的——只有一個缺憾，不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路徑。到後來，滲雜了許多投機份子。任何時代的史劇，都難免這一點綴的角色。但三十年代末中國史劇中這一人物，尾巴都繫着一根粗繩子，繩子的另一端的握執者，是外族——正在變更其面目但却戴着革命面具的外族。於是，不僅失了「五四運動」的歷史所指定的路途，還走入與原意完全不同的可咒詛的境地。他們不再爲本國的大衆而努力，却爲發發他們的外族而效勞。他們的指導者，是這麼一種的人，左手執著訓令，右手握着沙泥，腰間懸着案子。機會到時，按照訓令，用沙迷着大多數青年的眼睛，用泥土填塞青年的耳朵，用案子縛着青年的頭部。這就是他們的羣衆。

有了這「羣衆」，他們就光榮地走到政治舞臺。因為他們有了政治賭本。

到這時候，歷史又轉入另一階段。配合他們無出路的鬥爭，日本帝國主義趁機佔領中國的東北四省。這像一個刺針，刺着中華民族的神經。從驚痛中喊醒起來的人們，現在方知道他們曾走錯了路。於是民族主義，又成爲大眾所注目。但他們這一危險萬狀的期間，對於歷史應走的路向，並不比以前錯誤時期高明了若干。於是，握着泥沙，緊着索子的人們，又走上前來，對他們說：「我是革命導師」，「我是救國專家」，「你們跟我來。又有一大羣的「羣衆」被牽上政治舞臺。

我要這麼冗長地論述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之中有一種就是本書的主人公。他之成爲後日的「青年導師」，雖然只有一種政治的陰謀（後面會說到牠）相配合，而能够爬上這一地位，那需要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論述。

我們早知道「革命導師」魯迅有兩重人格，當他被創造社們拒於「革命」大門之外時，他的態度，就是那兩重人格的表現。周樹人的幽靈，告誡魯迅：你不要亂動，你要穩健；魯迅却爲他指出，由於革命「祖國」的存在等等，我不能不左傾。周樹人當然看到魯迅所給指事實，但却告誡對方：你忘却被北廷通緝的危險嗎？魯迅又爲他指出，這個險值得冒，因爲他的報酬是非常之大，而且他已備了三窟。周樹人滿足魯迅的估計，魯迅也接受周樹人的勸告。於是，兩位一體地，走上「革命」的魯迅。

但這只說明了魯迅。而對於魯迅的此後「羣衆」，也需要解釋。魯迅的羣衆，當然就是知識分子。除了後來被繩子縛上的純潔青年外，大多數是這麼一種人物。在四十年代，他們雖然還聽到過去的若干生動事實，但他們却不感興趣，只能當爲他們活動的政治資本。他們早沒有國家統一的念頭，他們只希望中國與帝國主義共存共榮（也許他們的主觀並不如此）地分爲幾十個國家，那麼多的國家，需要那樣多的元首，官吏，參謀，而他們就不愁沒有一席。歷史走到這一步，事後雖然可引起我們的悲嘆，但當時却不覺着牠。他們有些地方和巴爾扎克名作「人間喜劇」內的「浪子之王」(Prince de la Boheme) 相肖似。因此，我們要明白他們，應先說明「浪子」的特性。

法國大革命後，百科全書派的理想，用許多次政治革命去完成。但每一演變，似乎都不能證實「理性」的至高無上。青年的心望和抱負開始了大激變，遂產生「浪子」這名詞。看「福樓拜評傳」作者的解釋：

「便是當年，這也只是一羣前不把天，後不着地的青年，抱着一心情願的熱忱，從鄉鄙遠來巴黎，未嘗不自以爲將及有所大作爲。一而再，再而三的政變，變成若干非常的時機與非常的人才，成爲無數青年嚮往的目標。在這新舊組織交替的大時代裏面，他們用想像做經濟，用貧窮做勇氣，想從低微的階級，打出一條光明的活路；他們不要承繼父母卑微的職業，不要做一個無聲無嗅的傳教師，而且因爲拿破崙已老死於聖派蘭島，更不要投身行伍，粉

子之前，婦女一律平等」。

沒有一個人能够比巴爾扎克更正確的，對我國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浪子」，繪與恰適的形容。無需說，我這裏把魯迅後日所領導的人們，比於當時法國的「浪子」，是就政治的傾向及其生活的若干方面而言；如果說到文藝方面，那我們的「浪子」，和法國的「浪子」，就差得太遠了。法國的「浪子之王」尚夫瑞勒(Champfleury)，給法國文學史留下關於寫實主義的若干遺產，而我們的「浪子之王」——魯迅，却否定五四運動中關於文學的傳統，甚至還進而否定「漢字」(牠容諸後述)。

似乎我們說得太遽，應回轉來，談魯迅怎樣地披上「浪子之王」的桂冠。自一九三〇年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後，他逐漸地因創造社內部的分化，(詳見拙作「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團圓」元帥成仿吾的「被選」留德，蔣光赤的死亡，李初梨的不知何處去(到魯迅死後數年忽然出現於延安的魯迅紀念會上)馮乃超，潘漢年潘梓年的下落不明，他順水行舟地被推上寶座。他現在不是被圍剿者，而是中共勢力所及之文藝領域的統治者。左有胡風，右有黃×，大有天下英雄，唯迅而已之概了。

可是，在那樣時代，似乎和他的加冠不相合的。老人感到他，遂不能不先把自己安置在一個安全的所在。謝謝有一八四二年後一串不平等條約所產生的租界。他就居住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租界內——上海北四川路底。

我們尚未完全明白魯迅對於內山完造究有何種的詳細關係，但似內山那樣的人，成爲魯迅的朋友，成爲「反日本帝國主義導師」，這是死後加上去的。魯迅的朋友，要出於我們情理之外。容我在這裏先說明內山完造是什麼人！

住居上海的人，都知道北四川路底「一路」電車的盡處，有一家日本人開的書店。牠就是「內山書店」，牠的主人就是內山完造。這位短小結實的漢子，是日本軍部及內務省思想課駐滬的文化偵探，他的任務是勾結自稱爲「左傾」的文化人或政客，他的買賣方法在「一、二八」前是十分奇怪的。打一個電話，馬上送書來，且許你欠賬。像這樣的經營方法，應該是難於維持，但他的生意由他的支店的擴張，似與人們的料想相反。這書店是上海許多文人所曾光顧的，這不僅爲着他是魯迅的好友，還爲着他販賣許多其他書局不敢代售的禁書，有時尙陳列共產黨的宣言等等。此外，內山完造所負的任務，是介紹日本作家與中國作家——自然是「前進」的——的會見。到今日已判明是日本軍部代官入室伏高信與山本實造到滬時，就因內山的「介紹」，在四馬路某菜館中先後受中國「前進」作家的歡迎。

然而，這只算是內山的平時工作，到戰時，他的愛國却超出「前進」的中國作家的「抗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大戰發生時，內山完造是上海日本留居民所組織之「異國」中的積極分子。他臂上纏着「大日本帝國」臣民的徽章，手中執着手槍，在老靶子一帶佈防。曾拉走若干「抗日分子」，那我們尙無所知，但可斷言他不會光顧魯迅先生的。

事實的證明，內山完造和魯迅先生的關係，超出我們料想之外。當然，似魯迅先生那樣的「革命者」，誰敢說他是「漢奸」，那有天大的罪惡，他只是內山完造的朋友。內山爲什麼要交魯迅，也許他是靠他的大名而給自己在日本取得出風頭的機會，但總有一點，使我們不解的。內山既然不和魯迅先生一樣，是國際主義者，是蘇聯擁護者，如果魯迅先生口口聲聲說「抗日」，他怎麼容忍呢？

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三一年佔取中國的東北四省，魯迅先生與日本帝國臣民內山完造的交誼，依「年譜」的公開記述，是在一九三〇年，也就是在魯迅加入「左聯」的那一年。他於十月與內山完造開「版畫展覽會」於北四川路日本人的商店——「購買組合」第一店樓當年上，然而這只算是「中日親善」的開始。到翌年，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侵略中國的那一年，「年譜」說：四月，魯迅先生曾往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文化機關——同文書院演講「流氓與文學」，六月又應日本居留民的婦女組織——「婦女之友會」講演，講題是什麼，待考。這些紀錄，當然不能反證魯迅先生不反日，因爲這時候的日本，還未動手用武。但到「一二·八」戰時，「年譜」記着：「一月二十九日滬戰，次日，避內山完造店」，又記着：「二月六日，由內山店友護送至英租界內山支店暫避。」我們在十八世紀法國文化學史中，見到卡伯特家的祕密警察長與受政府監視的文人，如狄戴羅 (Diderot) 等的友誼，頗爲驚訝，現在看這記錄，却有驚訝中的驚訝。因爲，國與國的戰爭，居然有敵國的臣民，保護我們的

「文化導師」和激烈的「抗日」者！自然，我們的「大魯迅」——這是日本人的稱呼——不會因這些的個人友誼，而忘却對他的友人的「祖國」的憎恨。舉一個例，在「二心集」，於題為「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中寫道：「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衆，因為中國民衆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羣衆，永受奴隸的苦處的方針的第一步」。

的確，魯迅先生的晚年，「抗日」的意識更加激烈，但日本帝國主義並不因之要求租界當局逮捕他，恰恰相反，反暗中保護他。爲什麼呢？由上面魯迅的話，可以解答。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不說是侵略，而說是「膺懲」中國的「軍閥」，而魯迅先生除「蘇聯」不能放鬆外，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所指的「軍閥」，却也是他腦子裏的仇人。因此，儘管魯迅先生爲着「軍閥的奴隸」——「中國民衆」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但在反對「中國軍閥」的前提下，彼此却有心照不宣的默契。因此，上海的「大日本帝國武官」，諒解魯迅先生的「反日」，魯迅先生在他的保護下，也諒解於他們的「膺懲」中國「軍閥」。法國調和派經濟學創立者巴新狄意(H. Bastiat)的名言：「我爲你服務，你也要爲我服務」，在這裏得到證明。

如果人們熟悉中國的四十年代的歷史，會知道，就在這時期中國又多了一個國家，她就是「中華蘇維埃政府」。魯迅先生只愛這個政府，更愛這政府的主人，至於今日的國民政府在他眼中只作爲「南京政府」，並不重視。如果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維埃政府」，那我

們的魯迅先生也許會離開北四川路，可是，總只「隱憂」國民政府，所以，他可以置若罔聞了。誰細讀魯迅氏在這階段的「什感」，誰如感覺上面論述的正確，誰就會明白：魯迅對於中國未來歷史的途徑，毫不瞭解。

容我們再回過頭來，說這「浪子之王」在文學方面的動作。他現在不是保持離北京時的觀點，而是大口嚷着：「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裏面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出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論第三種人」）引了這一段，可以節省若干篇幅，因為這是我們文學史中「浪子之王」的思想的公式。這些話，在表面上說是堂皇的，是動聽的，是言之成理的，但在現實中，他洩露這五十三歲老人腦子的混亂。不錯，生在「有階級的社會的作家」，其作品不能超階級，與我們的「革命導師」，忘却了，這一語只在已趨入衰老期的民族國家內，有牠的意義，而在當日的中國，便沒有什麼價值，因為於個人與社會之中，還有一個國家。試問：在那樣的時代，描寫民族主義的作品，難道是「心造的幻影」嗎？到四十年代末，每個青年都會明白：我們的魯迅先生的話，不是無條件地可以相信的。

但，我們不能怪這老人，他只是「一架留聲機器，他雖然曾在「五四」之後，「吶喊」了一下子，但到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魯迅變成了「留聲」的人。他充當機器，按「訓令」而說話。他的心裏充滿了「幻想」，現實之每一事實，却成爲他的按訓令而動作的大諷刺。

正爲着這一原因，魯迅在當日以「戰鬥的時代」的「戰士」自居，起來反對民族主義的文學。他指從事這樣描寫工作的文藝作家——我在這裏不是說那一個個人，更不是爲那一個人的政治生活而辯護。——是帝國主義的「寵犬」。他在「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中說：

「他們所謂『文藝家』的許多人，是一向在盡『寵犬』的職分的，雖然所標的口號，種種不同，藝術至上主義呀，國粹主義呀，民族主義呀。爲人類的藝術呀，但這僅如巡警手裏拿着前膛槍或後膛槍，來福槍，毛瑟槍的不同。那終極的目的只一個：就是打死反帝國主義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僅有些不平的人民。」

「那些寵犬派文學之中，鑼鼓敲得最起勁，是所謂『民族主義文學』。但比起偵探，巡捕，劊子手的顯著的勤勞來，却還有很多的遜色。這緣故，就因爲他們還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沒有流氓的剽悍，不過是飄飄蕩蕩的死屍。然而這又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寵』的……」

「這『叫』和『惡臭』有能够較爲遠聞的特色，於帝國主義是有益的，這叫做『爲王前驅』，所以流氓文學仍將與流氓政治同在。」（『二心集』）

這些話，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報——「新華日報」上紀念魯迅若干週年所痛罵之「匪漢奸」該說的話，居然出於魯迅之口，多麼奇怪嚙！民族主義的文學，是現在每個青年所呼喊所欲寫和學的，但他的「導師」魯迅先生却說是帝國主義的「寵犬」。究竟是怎樣的？

幸好我不是青年，我也沒有這樣的「導師」，可不過問了。

可是，我應該引見卜生在其名作「皇帝和加利利人」(Kaiser or Galileer)中的話，贈給那些把魯迅作爲自己「導師」的青年們：

「你們是不能了解的，不會受一個「神人」的感化威力過的你們，是不能了解的。他在這個世界上所傳播的是教理以上的東西，這是閉塞你們感官的一種魔力，無論何人一到他的手裏，這人再也不會回復他的自由了」。

七 革文學的命

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家，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並被舉爲「執行委員」。又多了一個資格！所謂「保障」民權，是一幕滑稽劇，因爲事實上是保障中共的黨員。但這却沒關係，還是說他的文藝活動。

同年他編「文學」，刊「僞自由書」。一九三四年他五十四歲了，出版「北平箋譜」，印「南腔北調」，「淮風月談」，輯「譯文」。一九三四年五十五歲的他，譯班台萊夫的「鍊」編羅秋白遺作「海上述林」，同年又着手譯果戈爾的「死靈魂」。翌年，距他逝世前十月又編「海燕」半月刊，除了翻譯與「什感」，沒有一篇創作！

但這對我們的文學革命家，有什麼關係呢？他在這時期已被封了「中國高爾基」。這名詞的起源，是否與鄒韜奮的「高爾基」有關係，要待考，但自此起，已成爲衆人皆知的綽號。

以高爾基比魯迅，恰似以「唐·吉訶德」比「阿Q」，因為有些相似又有些完全不同。在這裏，對這問題，不妨花若干篇幅論述牠。

關於高爾基的歷史，正像俄國現代史，隨政治年曆而不同。但是，在我們這一國度中，却易於考據。因為有一個被第三國際所批准的「救國專家」鄒韜奮先生，曾編譯一本書，牠就是「高爾基」——出版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再版本，有大刪改）現在我以這本「革命者」的作品，從事對比的工作。

從世代說來，高爾基與魯迅有這差異：前者是赤貧無產者的兒子，而後者却是書香的後代。從生活的狀況說來，幼年的高爾基是流浪者，而幼年的魯迅却沒有那樣的離奇記錄。就職業說來，高爾基是碼頭工人，糕餅店徒弟，守夜者，而魯迅除了知識分子的工作，兼教員，學監，校長之外，與工人沒有任何關係。終其一生的高爾基，未做過羅曼諾夫王朝的官，而魯迅却充當北廷的十四年教育部僉事。高爾基是沙皇的反抗者，魯迅却是袁世凱、曹錕、段祺瑞們的小吏。總一句話，在這些的記錄中，就是最能幹的會計師也無法做出一張清算表。但却有一面的相似，那就是政治的意識，高爾基表同情於俄國的革命，係由於他的生活，而不是由於他的認識。的確，他有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的朋友，但他却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雖然和列寧有往來，但他却不是列寧在革命鬥爭中的可靠友人。這就是他自己所公言的「我是一個蹩腳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的魯迅，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恐怕連使用這「蹩

脚上兩個字的資格都沒有。……自發赤衛隊上首、三國青年團由米爾斯夫夫當政、中
國會高爾基在政治行動上，做了不少使人頭疼的事情。他會和「馬哈主義者」一起在意大利
路普里辦學校，不管列甯的反對。他在二月革命後，充當「保護祖國主義者」，用「公開信
」贊成克倫斯基政府的參加帝國主義戰爭。列甯對這行為，曾給與下面的斥責：

「這封信完全充滿着一般普通國民的成見，看到這封信的人，便覺可恨。此文之作
。爾基（列甯自稱）前往喀普里的時候，曾經面責高爾基關於他的政治的錯誤，並警告他以
外以後不可再蹈覆轍。高爾基閃避這積極責備的方法，却是現出一種親密可愛的笑容，和下
面那樣直率的話語：「我知道我是個蹩腳的馬克思主義者，況且我做藝術家的人都是些
。不負責任的人們。」……對於這樣的宣言，却不易於和他爭辯。」（據著「高爾基」
海峽三五七頁）

但這還是次要的一到「十月革命」的前夜，高爾基的「新生活日報」，是反對「革命」
的人們發表其公開意見的刊物，而他本人却在十月三十一日（新歷——）舊俄歷「十月革
命」，新歷是譯為「十一月革命」的社評上，反對「布爾塞維克的起事」（同上三六七
頁）。及克倫斯基政府傾覆，發施「勿躊躇或懷疑，堅定，穩固，堅毅，決心，革命萬歲」
的「簡潔扼要」命令的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托羅賓斯基（就是魯迅所寫的「托匪」）在彼得格
勒蘇維埃的會議裏宣布革命成功（同上三七〇頁）後，「高爾基對於勝利後的布爾塞維克的攻

擊，其嚴刻爲從來所未有。」（同上三七一頁）。他不斷地罵列寧，稱他爲「社會主義的拿破崙」（同上三三七三頁）。到布列斯托和約訂立後，他又罵以「無恥的尾聲」罵列寧們。這有一大批不勝枚舉的材料，但魯迅終其一生，却是「十月革命」的政府的謳歌者。如果，把魯迅與成仿吾們的論戰，比高爾基之反對布爾塞維克，那不相似，因爲成仿吾在當日不是中國共產黨百分之百的代表者。

晚年的高爾基，一改其前此的態度，變爲蘇維埃政府的贊頌者，因之，他刪改自己以前恭維托羅資基的形容詞，並歌頌托氏的反對者。魯迅呢？他未曾留下反對中共任何人物的記錄。這應是從流浪長大的高爾基與從北廷官僚大學中養大的魯迅不同性格的唯一原因。

在對出的工作完了後，我們却有一個發現，那就是「中國高爾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的執行者，不是完全服從的，也有反抗。但聰明的他，把反抗的事件，化爲對付個人。關於這一點，是他晚年——不，將死前的大事。值得我們給與詳細的論述。

我們應先明白：中國共產黨的文藝陣線，有下面的各階段。在一九二七年，中共的「八七會議」以後，牠的文藝政策，就是要建立以成仿吾，李初梨們爲代表的「普羅文學」。到一九三二年「紅軍」有了根據地，並建立「蘇維埃政府」後，牠的文藝政策，是呼喊創造「社會主義的寫實文學」，因爲中共把江西的「天國」，稱爲「社會主義」的社會。但這只是過去的遺跡。歷史告訴我們，自從希特勒上台，第三國際的主席由史米特洛夫充當起，中

共執行他的決議：從事「民族陣線」的運動，不需要那「蘇維埃政府」，並高掛「國防政府」的大牌。既然在政治上有了激變，那在文化中也就不會沒有與之相應的變更。於是產生了「國防文學」(註)。

(註)耳耶氏在「創作活動底路標」中說：「『國防文學』這一口號是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提出的」(「魯迅訪問記」四四頁)。

為什麼需要這一轉變呢？中共的負文化工作責任者周揚在其「現階段的文學」中，加以解釋：「華北事變以後，中國的形勢引起了一個新的基本的變化。遠東帝國主義併吞了整個華北，又在準備併吞全中國，亡國的危機把一切不願做亡國奴和賣國賊的中國人逼上了一條唯一的道路，就是一致向侵略者展開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全民族救亡的統一戰綫正以巨大的規模伸展到一切領域內去，文學藝術的領域，自然也不能例外。國防文學就配合目前這個形勢而提出的一個文學上的口號。牠要號召一切站在民族戰綫上的作家，不問他們所屬的階層，他們的思想和流派，那末創造抗敵救國的藝術作品，把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總流。」(同上，一七三至一七四頁)正爲着這一理由，所以，另一中共文化工作者徐懋庸說：「國防文學，是現階段的文藝界統一戰綫的口號，並不單是左翼革命文學的現階段的口號。」(同上，一〇七頁)。

我們在把這問題依其事實而擴大前，應說明一點。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正像牠的主人，

對於任何意見，都是按政治市場的需要而發表的。自然，我們不是說：中國共產黨在文化上由「無產階級革命」，轉變為「民族統一戰綫」，就中國說來，是歷史的退步。我們暫不說，牠的言行不一致，我們要說的，是每個青年對這轉變的原因，應當知道得明明白白。

這只是假這種轉變，是發動自第三國際而不是發動自中共，所以，中僑牠在當時黨內有反對這轉變的論爭，在左翼方面也有這口角。這不必重視，因為牠只算做一個物理學慣性定律的發現，經過紀律的處分或調整後，總會一致的。我們所要發達的，是他們怎樣的調整。

「與」新東方」等刊物上所發表的主張為代表，他的論點是如此：「一九二七年的血的洗禮，在階級定律支配之下，發生了兩個反對意見。第一是「左」的，以徐行氏在「禮拜六」

「調」我們只知道真正澈底反帝的社會層，是中國出賣勞力的大眾，只有他們是前進，也只有站在這觀點上的文學才是挽救中國的文學。」

「其餘各階層都是被歷史車輪軋碎了的廢物。」

「所以我反對現時一般人所聽說什麼不問派別，團體，個人，宗教信仰，只要贊成

和擁護救亡運動的都可以而且應該聯合起來的胡言。」（同上四六頁）

按照上面的論點，牠提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代替「國防文學」，這種觀點，自然

引起中共文總的斥責，他們一致指徐行的主張是「胡言」是「夢囈」(註)

(註)參閱周揚的「關於國防文學」(略評徐行先生的國防文學反對論)一文。

如「徐行先生」那樣的人物，中共的文總可以不費力地一槍把他的生命結果了，但却有另一派，不易於應付。這一派的出面人是人們共知為魯迅先生的高士胡風。

一九三六年五月，胡風在「文學叢報」上以「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提出一個新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種文學的任務，是：「證明勞苦大衆底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勞動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奸細……」許夢人，起而附庸胡風的主張。『夜鶯』的「批判文學陣綫」的種種荒謬公案，『創作自強和聯合問題』的作者聶紺弩，『實現文學』上「一點意見」的作者張天翼，『創作活動底路標』的作者耳耶等等。無需說，這個異端，不是中共的。『文總』所允許，所以周揚與徐懋庸起而「糾正」牠。周揚斥責胡風道，「胡風先生……對於民族革命的形勢的估計不敏。他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祇在『失去了的土地』上『存在』和『奮起』。他而忘記了民族革命戰爭的主力在全國範圍內不平衡的發展和牠的巨人的存在。他決沒有認識促進全民族革命戰爭之實現的是人民救亡陣綫的實際活動，而決不祇是像他所說那樣空空洞洞的『熱情』、『希望』等等的也抹殺了目前瀾漫全國的救亡統一戰綫的鐵的事實！所以對於『統一戰綫』、『國防文學』一字不提？」(同上，一七五頁)徐懋庸補充

一句話：「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不足以表示目前的現實，不足以對太平天國運動之類的戰爭表示分別。」

雖然雙方的論爭，難找出有顯然分歧的意見，但論爭的範圍卻擴大到茅盾與魯迅的身上。這兩個「左翼作家」的元帥，現在站在胡風這一邊。無庸說，這個表現，既使周揚徐懋庸失去他們的威風，又使中共左右爲人難。因爲魯迅與茅盾一離開了牠，牠在左翼文學界的統治，就會動搖。

魯迅怎樣反對呢？分爲兩方面，第一是把這反對作爲個人的事件，使中共在紀律上與威信上有了面子；其次是理論上爲胡風後盾。我們先說後者。

魯迅於中國文藝路線，自不是「唯物史觀的門外漢」後，早在一九三二年爲美國共產黨刊物「新羣衆」作的「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曾說：「現在在中國，無階級的革命的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因爲，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二心集」）但雖然有這麼一句話，魯迅先生却不能不跟中共的總路線走。若使說，除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了，那麼，爲着「無產階級」的而又「革命」的文藝，依當時左翼者的解釋，就是「社會主義的寫實文字」，應盡「徐行先生」的主張，很爲魯迅所贊成了。但事實不是如此。因爲胡風先生不過是魯迅的廣播機。

那麼，魯迅先生的高見是什麼，却值得加以研究。他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十日病中答訪問者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爲胡風後盾地提出如下的意見：

「左翼作家聯盟」五六年來領導和戰鬥過來的，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運動。這文學和運動，一直發展着；到現在更具體地，更實際地發展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現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這種文學，現在已經存在着，並且即將在這基礎之上，再受着實際戰爭生活的培養，開起爛漫的花來罷。因此，新的口號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藝運動的停止，或且說「此路不通」了。……但有些我的戰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夢」者，我想，也是極糊塗的昏虫。」

究竟徐懋庸和周揚是否「極糊塗的昏虫」，那非我們所知，我們所驚訝的，「革命者」魯迅先生的「戰友」，怎麼是一匹「昏虫」。但仔細的想一想，却覺得這驚訝大可不必，因此魯迅先生的理論本來就是和「昏虫」差不多的東西——由人退化的猴子。爲什麼呢？

我們由歷史，知道一般第三國際理論的主張，說：人類社會的進步是按這一路徑，由原始社會而封建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而無產階級革命。至於文學，則由古典的貴族文學，而浪漫文學，而寫實文學……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所謂「民族革命」，按馬克思主義說來，是屬於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歷史階段。如果說：中國的歷史，已走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並已有「左翼作家聯盟」爲這革命寫了「五六年」的「文學」，何以忽掉轉頭來，說這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呢？是由「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發展到「民族革命的大衆文學」，還是由後者發展到前者呢？魯迅先生自稱是進化論者，竟有這一倒退的進化。進化論者一致證明，人由猴子來，而我們的魯迅先生，却說猴子的由人來！高爾基對列寧說得好，我是驚脚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藝術家的人都是不負責任的，中國的高爾基自然也有對任何主張不負責任的權利。若使中國共產黨的轉變是由人到猴子，那麼，魯迅先生的進化論，倒不是沒有事實。(註)

(註)但要聲明，這轉彎就中國歷史說來是應該的，但就中共及魯迅之過去主張看去却是矛盾的。

但「昏虫」——而且是「糊塗的昏虫」們的主張，並不和「昏虫」的「戰友」魯迅有什麼不同，那何者又多一口號呢？魯迅不能不加以補充。接着說：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正如無產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體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學』……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

原來「昏虫」與非「昏虫」的論爭，只在於「總口號」與否，而這一點，又是分別是否「昏虫」的標準。我們可以明白，經了滿力汗諾夫的教習之後的魯迅，還是那麼「朦朧」。

在文學史上從未聽見的「救亡文學」，「抗日文學」也會拋出來。就這樣文學的內容說來，恰如德國在席勒時期的若干作品，但誰也沒有說那些東西是「救亡文學」。這也沒有關係，因為中國人是處於發明而內容而不同名詞的天才者。中國的高爾基，就是這類天才者之一。

我們所說把這論爭，視為反對個人。這個證據，就是著名的函件——「答徐懋庸並關於統一戰線問題」。這信的日子，是一九三六年八月三至六日，而到十月十八日，他就「氣喘不止，十九日上午五時二十五分」就逝世了。若干人因之說：魯迅扶病作書罵徐懋庸，體力不支舊病復發而死。是否確是如此，那是「魯迅內傳」作者的任務。

徐氏於八月一日寫信告訴抱病的他：「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爲之詭，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爲私有，眩惑羣衆，若偶儻然。……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去用以稱「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德以有先生作着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權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他又爲魯迅指出：「現在的統一戰線……固然是以普羅爲主體的，……但在主觀上，普羅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

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綫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是不對的。」

上面的信，是給私人的，但魯迅「沒有得他同意」，就把牠發表，並加以反駁。

他首先指出這位「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是「惡劣的青年」，甚至懷疑到他「是否敵人所派遣」。而後他以「白衣秀士」比徐氏。對於論爭的口號，他公告對方：「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的一個。……可惜的就是只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商討。」接着，他帶諷刺地說：「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此外，並未到過鹹肉莊或賭場，並未出席過什麼會議。」最後他報告「左聯」人物，生活方式：「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舊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整敗落的婦姑勃谿，叔叔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噉噉索索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這衣鉢流傳不絕。……我看徐懋庸也還是一個噉噉索索的作者。」結語是，他勸徐「細讀他『餉能生存』也要細讀與學習的「斯大林傳」。」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才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

對於他們的爭論，我在這裏不能加入任何意見。（註）我現在請讀者再研究另一宗事，牠

就是魯迅對於「五四」傳統之「文學革命」所取的態度。

(註)在魯迅與周揚徐懋庸爭論的時候，忽然發生另一宗事。那就是當年六月九日他發表答「託洛斯基派的債」。他在覆信前附有一封署名陳某某的函。函中大意是爲他攻擊徐懋庸及史太林派。一般人以爲這陳某某就是鼓勵魯迅寫文章的陳獨秀，陳氏那時在南京牢內，有沒有寫牠，我們自然不知道，但文體等等都不像「新青年」主編者。魯迅就在覆信內大罵托派。我不引全文，因爲牠已被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刊物不知道引了若干次。但內中有主要的幾句話，却值得一閱：「他們(指托派)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下去。」又說：「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爲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要明白一點，當魯迅寫牠時，是蘇聯公告「托派」勾結德國及日本的時候。但這時間是在「德蘇協定」前，自然更在「日蘇不侵犯協定」承認「滿洲國」前。我們在這裏不說魯迅反「托派」，只提醒人們：要知道這幾句話，是魯迅死後被中共開會追悼，並設立魯迅藝術學院的諸理由之一。因爲。一面捧死人，只一面利用死人罵自己要罵的人們的話，地無論東西，其動機與用處則一。

我們早說過：「五四運動」之一表現，是文學革命。革命的結果，以白話文化文言，使

中國青年的思想起了大解放。我們的魯迅先生的「吶喊」，就是這革命之一成果。文學革命的傳統，爲着陳獨秀後來手創中國共產黨，更形地撮在該黨手中。她利用牠，使她接近青年，但到一八七會議「前後，她的利用已給與新的名詞，那叫做「革命的文學」。由「文學革命」轉爲「革命的文學」這是第一變。魯迅先生對這種變，爲着他與牠本不相涉，自然猶如無所謂的態度，又如我們所已知的，他還和「革命的文學」兩字能成仿若大將李初梨們口角了一次。到中共利用日本帝國佔領東北四省的機會成立蘇維埃政府時，中國文化立場上，忽然發生「拉丁語運動」。由「革命的文學」到「拉丁語」這是「文學革命」轉變的第二階段，也就是牠的最後階段。拉丁化漢字，起源於海參崴。蘇聯爲補救中國華僑認識漢字的困難，創造拉丁化的文字。把中國分爲若干語言區域，先制定「官話」區的拉丁化。後來中共把這種文字傳到國內，到現在牠已成爲中共的工作之一了。我在另一本書：「由文學革命到拉丁文學的命」中，已爲牠的讀者指出：中國文字的應該改革，是數十年來文字學者及教育家所不斷呼籲的，而且還舉行了若干次的試驗——如注音字母等等。但還是抗戰以前的。戰爭發生，爲着文字是加強中央政府統一及鞏固中央政府的武器之一，我們如發然的取消牠，依各地不同方言，用拉丁化拆出，其結果是破壞統一與團結。因此，在抗戰期間主張取消漢字及推行拉丁化，不管其主觀如何純潔，客觀上都將成爲民族的罪人，但是，這僅就抗戰期間說的，戰後國家獨立，民族無外患侵侮，我們關起門來討論應否拉丁化等，那又是一個問題。

現在試問「前進的中國思想家」魯迅先生，對這宗事，究取何種態度呢？

由於魯迅先生的政治意見眼中共走，我們可以料想對於拉丁化與否的問題，自然也唯中共的主張為依歸，但他應該要比「魯迅」徐懋庸高明一點。他說：

「漢字的根深，使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中國人民決不會聰明起來，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壓榨，整個民族的危機，我是自身受漢文苦痛很深的一個人，因此我堅決主張以新文字來代替這種障礙大眾進化的漢字。」（一九三四年：「門外文談」）

他的結論是：「漢字和天衆，是勢不兩立。」（參曹聚仁先生語）。但為什麼漢字會和天衆隔離起來呢？魯迅先生不是歷史家，他只能「憶測」。為着「思想家」的一切，總值得常人的重視，所以我們不能不看他怎樣「憶測」：

「我的憶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天原國便是字難寫，只有節省些。」（「門外文談」）。

高爾基面告列甯：藝術家們的話是不負責任的，我們的「中國高爾基」，似乎也如此。言文不一致，「大原因便是「字難寫」，這若使不是發明，也算是新思想，說到這一點，魯迅的「前進」，是前進到胡適之先生的背後。因為胡氏在「白話文學史」所提出的意見，比高明的魯迅還高明的多。——但胡氏也缺乏歷史的理解。

可是魯迅的拉丁化主張，在中國近三十年的文學史中，却有一大意義。那就是革去了文學革命的傳統。魯迅本不是這傳統的手劍者，他只靠這傳統從「鐵屋」中走出來「吶喊」，不圖由於他會把「吶喊」變成呼號「便無需要方塊字了。因此，他告訴訪讀者：『漢字不滅，中國必亡。』」自然這是剗伯溫式的預言，但於他的「思想」，却有茅盾給與否定。在「關於目前文學運動的兩句問題」中，茅盾氏教訓周揚說：「我不知道周揚先生到底知不知道中國新文學當初怎樣爬出頭來？我告訴你：白話文是在中學校取得了和文言文同等自由權利以後這才猛速發展的。」茅盾先生對這發展，非常樂觀，他並沒有說：用漢字寫的白話文一天存在，「中國必亡」。我們要明白，這是魯迅眼中中國的「必亡」，不是他老眼。看之毛澤東先生的蘇維埃共和國的不存在。可惜，這預言再過一年就被證明其不確了。幸好，有了統一的文字，我們在抗戰中，把不同語言的各省同胞團結成一條血的長城，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八 傳 贊

「魯迅批判」的作者李長之先生，曾從魯迅的生命史，做了下面的公式：

「我們可以這樣說，倘若不是陳獨秀在那裏辦新青年，魯迅是否獻身於新文化運動是很不一定的，倘若不是女師大有風潮，魯迅是否加入和「正人君子」的「新月派」的敵門，也

很不一樣的。一九二六年假若他不出走，老住在北平，恐怕他不會和周作人的思想以及傾向有什麼相連，他和南方的革命勢力既在接觸，恐怕也永久站在遠處，取一個旁觀，冷嘲的態度，是不會太向往，也不會太憤恨的；一九二七年假若他不是逃到上海，而是到了武漢，那際，也許入於郭沫若一流，到政治的漩渦裏去生活一下；一九二八年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假若他久住於北平，則也敢說他必不受到左翼作家的圍剿，那末，他也決不會吸取新的經驗，他一定也於是一個個人主義的不馴的戰士而已，也不會有什麼進步；——然而，這一切都不是的，事實乃是陳獨秀辦了「新青年」，女師大有了風潮，一九二六年他離開了北京，一九二七年從廣州到了上海，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他沒有打算再久住北平，所以，他成就了現在的魯迅。環境的力量有多大。』

（五七至五八頁）。

這種公式的論述，是非常正確的，但尚須加以一個詳細的說明。不錯，環境會影響人，尤其是多事的二十年代末的環境，會影響一個無思想的人。魯迅接受環境的影響，由官僚而「吶喊」的作者，由教師而文學家，而變為中共的馬前卒，死後又成爲他的工具，其間雖有許多曲折，而他的兩重人格，是使他迎納這些環境的一個動力。就以周作人爲例吧。他是魯迅的弟弟，他也曾留學，也曾當教師，也曾寫文章——寫不壞的文章，也曾是公認的文學家。爲什麼他不會和他的老兄走一樣路，不，還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在北平的文化漢奸呢？這全

由於周作人沒有光明的一面。

魯迅爲着魯迅先生有兩重的人格，所以他在光明與黑暗的交織中，盡了他的一生史實。但他決不是一個「思想家」，他在思想園地裏，是一個無聲的人。他也不是革命者，他在革命的領域，一些事也沒有幹。只有淺薄的人，把一些吶喊，視爲革命，把反對政府的情緒，視爲革命。爲着這一點，我同意李長之先生的話：「魯迅在許多機會是被稱爲一個思想家了，其實他不夠一個思想家」但我却不同意於李長之先生把他稱爲「戰士」。如果這兩個字形容得當，那應如此補充地說：魯迅是反遺老反軍閥的戰士。

魯迅在反北洋軍閥及擁護辛亥革命所革去的社會中，魯迅向光明一面，留在他的「全集」中。但他只能取冷嘲的態度，不能夠有積極的動作，也爲着這一原因，他方被陳獨秀們由「鐵屋」中喊醒起來。

魯迅可說是文學革命後的文學家。他的文學和他的反北洋軍閥的統治，是和諧的。這一和諧，說明他是落後世代人物及生活，最好描寫者——沒有一個當時的人，會超過他。當人們大致擁護這，把魯迅稱到「革命導師」，「青年導師」的地位時，我的一點批評與批評的宗旨，說魯迅是文學家不是革命家或思想家，——有若干人在怒罵我，但他們忘却了一個神話中的故事：狄坦神想登天，結果却摔到地下去。

現在容我們談魯迅的個性。李長之先生爲我們舉出：「魯迅滿頭激尾是在憤懣裏」，依

李先生的見解，因為他是有情感的，所以他如魯迅在「兩地書」所說：「性情太特別，有所憎，卽刻不能耐，坐立不安。」對於一些人過於感情用事，簡直不顧在一地時，而對有些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湯蹈火，一旦覺得不副所望，便悲哀起來。但這些解釋和說明，只能算做由兩重人格的交鬥而起的漩流，並不是久慣了實際生活的他，尙能保存這一情感。我們知道有情感的人，是有合羣性的，但魯迅却喜歡孤獨和自私。不說別的，以他對景宋爲例。她在他死後，曾有這樣的追憶：

「偶然也有例外，那是因爲我不加檢查地不知什麼時候說了話，使他聽得不以爲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麼不痛快，白夫人事紛繁，和友朋來往，是毫不覺得的，但到夜裏，兩人相對的時候，他就沈默，沈默到要死。最厲害的時候，會茶煙也不吃，像大病一樣，一切不聞不應。……他不高興時，會半夜裏喝許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時候，……跑到空地去躺下。……這些情形，我見過。……一天半天，慢慢雨散雲消，陽光出來了。他會解釋似地說：「我這個人脾氣真不好」。因爲你是先生，我多少讓你去些。」我的答話。但他馬上會說：「這我知道。」（魯迅的創發方法及其他）五至六頁）

看完這一段回憶的人，可以想到，如果不是景宋女士給他以痛苦，那他的生活，對於自己已的妻，尙不過如是，別兩更不必說的。多麼自私的老年人。我們可以想到：當他說完：「這我知道」的一句話後，對方的心已碎了若干片，這種事，在魯迅幹來，是偉大的偉大，

而在別人，無需說，「不可爲例了」。新丁苦于我，感其意，欲於其書中，景宋女士的謝大，證明他的自私，景宋女士又有這一回憶：「他更不願意借書給人，除非萬不得已。……有時送給他的叢書，爲了急於把同類的包藏起來，就是我預備看時也會嫌等得太久而包起的，曹禹先生的「日出」，我就沒有看完，給劉然中止，好像電影正開到一半停住了的不舒服。」（同上七頁）

因爲自私兼孤獨，所以，如李長之先生所證明的，「魯迅在靈魂的深處」，有了「枯燥，荒涼，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特性（氏著一九八頁）。無需說，這特性之敢表現出來，只在對方的力量和他的預定要走的人生道路無互礙之處，否則他會把牠們毀匿起來。因此，他可以把徐德庸的私函公開，並在人們面前痛罵他一頓。

除了上述的個性外，魯迅又善於作僞。景宋女士回憶了下面的事：

「做學生的時候，我會正如一般玩童，邊聽講邊把這位滿身補釘，不，滿天星斗，一團漆黑，長髮直豎的先生速寫起來，我更很快就研究他的爲什麼？後來比較熟識了，我問他是不是，特意做成這樣的「保護色」，使人不注意，他好像默認地笑了。」（上引書二頁）

「在北平時，京城有一家法國點心舖，算是那時首屈一指的了，很難得的機會，他總從收到的報紙的稿費裏買兩塊雞蛋糕來吃，而且也歡喜請我們。有時我怪問他爲什麼剛纔不拿

出來請客，他却嘆息地說：「你是不曉得的，有些少爺真難弄，吃了有時反而會說我閹氣，經常吃這樁點心，不會相信是偶然的。」（同上十頁）

只有深於人情世故的人，方會作偽，魯迅在官場混了十四年，自然學會了他。因此，他以牠應用於「少爺」。但這只算是他一生生活上所知道的一例。

最後，容我們研究魯迅逝世前，對於「左傾」行爲的自我感覺。我們知道：從魯迅的生活說來，他是無法接近當時的「浪子」們，但黑暗的一面，却使他與他們鬼混，鬼混雖然有了「中國高爾基」等代價，但光明的一面，在暗中責難他，還引起他的矛盾生活。從公開的立場看來，他應寫無產階級革命的文藝，而該階級的生活，他却不能領會，因此，他擱下了筆來以「什感文」而自欺欺人。但他內心的苦悶並不因之而消失。諺云：「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適用於將死前解除其內心久鬱的苦悶的魯迅。也爲着這一理由，他在教訓徐懋庸的公開信中，爲人們指出：「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亮子弟。」他又告訴人們：這些子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嗾嗾嗷嗷，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他最後嘆一口氣似的說：「這衣鉢流傳不絕。」所謂中共文化路線的指導者，不過是「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爲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嗚呼爲唯一的業績。應這些話，是牠以左聯負責人的自供。他能够吐出這一供詞，就爲着牠有

兩重的人格，不會和那些「奴隸總管」，永久地墮入十八重地獄中去——也正爲着這一原因，當他的屍體移到膠州路殯儀館時，中共的文總派手下在附近散發傳單，指摘他有「錯誤」。但這不能使魯迅本人的真正價值，因之而化爲烏有——更不必說，不久之後，反對他的「奴隸總管」們却在他的靈前從事懺悔了。

所謂魯迅的真正價值，就是他以文學家身分，指摘中國舊社會的殘渣。他是這工作的優秀者，他又是這工作在文藝上的唯一完成者。我有這一感覺：如果沒有中國的社會發展的混亂情況誤了他，他會在寫實文學中，佔了一個重要的地位。也許他會成爲我們的羅穆拜。至於今日人們用「思想家」，「無產階級革命家」，或「青年導師」等尊稱他，這是一些也不相稱。因此，在我們需要重新估計魯迅時，應抱「凱撒歸凱撒」的宗旨，恢復魯迅先生的真正價值。

魯迅先生，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他是一個偉大的導師，他是一個偉大的戰士。他是一個偉大的靈魂，他是一個偉大的靈魂。

兩個高爾基不愉快的會見

正在「靜靜的頓河」邊休養的高爾基，由當地格拍烏手中轉到嚴厲口氣的電報，要他於四十八小時內，前往土耳其斯坦指導「支那高爾基」們。雪和瓦片一樣地降着，飲「伏特加」酒還怕體溫不足的老人，急速地同他的安特烈伊娃，向目的地出發，臨行時，他有一個感覺：資產階級的文學家，李達，哈加德（Rider Haggad）在他的著作「她」（She）中，所描寫的有些先見之明。因為，天國和人間有刑罰和命令！他打個寒抖，問通幾國語言的安特烈伊娃：「親愛的，你一定懂得方塊字，究竟「支那高爾基」，是那種人？他幹着什麼，何以要我來指導，指導他的是什麼？」露出舞台迷人姿態的女人，帶着思索的情緒，這樣地回答他：「亞萊奧塞，親愛的，世界上還有方塊字嗎？他老早斯拉夫化了，不過戴個「拉丁」的帽子而已。但「支那高爾基」這名字，像日本人的姓名，和中國的大不相干」。老人好似被吊到高空，他自己問自己：「天噫，這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旅程的終點，有一羣黃臉皮的人們，恭敬地等待高爾基——不，是在迎接他。一位，帶着紹酒的氣味，八字鬚，醉眼矇矓，自命不凡地，走前來，（後面隨着一個剪髮的女人）對老人伸出黃皮膚的手說：「阿拉姓周，不，我姓魯，名迅，綽號「支那高爾基」。馬克辛同志，我告訴你，這名字是我天子第一號朋友，刮刮叫的朋友，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內山

完造們加在我頭上的。同志，我會對我的兒子說：我不配。但他們一定要這樣尊稱我。我十分慚愧，不，高爾基同志，我十分光榮。因此，我是你在「支那」、不，我是說：在中國的化身」。

高爾基的血流有些反常，他壓住外來的刺戟，回頭對安特烈伊娃說：「親愛的，今天周圍的空氣，太像一九〇七年的倫敦。記得嗎？親愛的，給他們一些便士，不，給他們一些盧布吧，免得被瘋子們延攔了我們的任務」，但女人柔媚的表情和答語，立即改正了老人的錯誤，知道這些「瘋子」就是他所應盡之任務的對象。

「同志，你的俄國話說得真好」握手時候，帶着諷刺的話兒，由老人的聲帶洩出來。「一陣「烏拉」，「萬歲」的呼聲，從人羣中怒吼了。高爾基有些不自在，他好像發現了人間的真理，因為這種儀節和梅毒的細菌一樣，會闖進萬里長城！他接着向對友說：「先生，這些人是爲什麼而來？」

「馬克辛同志，他們都是你的仰慕者，又是我的門徒。他們特地趕到這裏來，一面親聆同志的訓誨，一面寫「報告文學」，向書店老板賣些錢」。這句話似乎有失說話的尊嚴，「支那高爾基」，在行文上，和師爺一樣老練地不能不有下面的補充：「同志，支那的書店老板，和沙皇時代的，大不相同。他們都是普羅的，他們的工作非常好，他們也會在莫斯科印過萍蹤，他們會翻譯馬克思的作品」。

感着厭惡的高爾基，不願再說下去，他介紹安赫烈伊娃給伸手者，站在對方後面的黃臉皮女人湊上來。「支那高爾基」，急忙地向高爾基說：「她是我的愛人，名叫『小鬼』。高爾基開動他的脚步，想着：『的確今天走進鬼國中，見着鬼，到處都有鬼，沒有一個人！』」

有秩序的步伐聲，似軍隊的節奏；有些工夫，「支那高爾基」問老人道：「同志，你近來有傑作嗎？」這句話提醒了老人。他問非所答地對「支那人」說：「爲什麼你被人綽號做『支那高爾基』呢？你的那個作品，給你享受這個綽號呢？」

黃臉皮的高爾基幸有紹酒的掩護，把發燒的表情掩藏起來。經過一番思索，他只能拿出「阿Q」。他自己想，這一定會使高爾基拜服，因爲「阿Q」曾給他以無窮的勝利。不幸得很，有一個似雷鳴的聲音，吹進他的耳膜：「阿Q從作風說來，是西萬提斯氏「唐·吉訶德」的中國版；從筆調說來，值得一讀；但他的意識，是中國死亡社會的反映。那裏既沒有一些普羅的氣味，又缺乏應有的呼聲。總而言之。中國早沒有「阿Q」，「阿Q」也早已死亡了；還以爲留着氣息的，只是「支那的阿Q」！」

「那麼，爲什麼，牠會有廣大的讀者呢？」從音調中活躍着驕態。

「理由非常簡單。當你的「阿Q」降生時，是中國浸在革命高潮的時候，所以「吶喊」無靈，「阿Q」在文化橋上和躺在刑場上一樣，青年吝惜他的眼光。到「九·一八」發生，中國內部開始了民族獨立必經的統一階段，不能不對日本採取外交的敷衍，敷衍使無知的小

資產者起了憤怒，對政府失望，並把她看作「阿Q」。「阿Q」既成爲那些阿Q的洩氣對象，遂由墳墓中走出來。可是，缺乏人氣的牠，又和你一起葬在公墓裏。不客氣地告訴你，「支那高爾基」先生，你的作品，除爲中國人供給你父親時代生活的狀況外，沒有別的東西；你的名譽（如果有的話）不是你的師爺文筆——潑辣，刻薄，簡潔的代價，而由於你的投機。當創造社時代，你被該社罵在「醉眼朦朧」，你譏笑他們的「普羅文學」；但善於投機的你，發覺「阿Q」被虐待的原因，便阿Q式投入自命爲「前進者」的垃圾中。於是，你的本領和你的名譽一天天地反比例起來。人們愈捧你，你愈自慚愧，所以你自「吶喊」後沒有作品，除非發揮小資產階級反統一運動的精神而罵人。總之，你是文化的投機者。你不配稱我做同志，也不配頂我的名字而自抬身價……」。

安特烈伊娃用特別的手勢和信號，提醒了滔滔不斷之老人的處境。打一個寒慄，高爾基似委曲地沈寂起來。但感受侮辱的對方，在酒醉的情況下，忘了一切地怒鳴了：

「馬克辛！請你照照自己的面孔。我如果是文化投機者，你呢？在俄國歷史中，你的功績，有下面我念出來的紀錄：當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時，由列甯給你的信，證明你對布爾塞維克的態度，是非常的壞，真理報要你的文章，每十一行送二十五戈比的稿費，這怕你不答應。後來，馬哈主義出現，你是他的信仰者。就到蘇維埃取得政權，你還寫信對法國作家法郎士（Anatole France）咒罵革命說：「無產者並沒有勝利，內亂騷動全國，幾千萬人互

原书缺页

相屠殺，瘋子們在真理報上大叫「打倒資本家」，「逮捕立憲民主黨」，但資本家也好，立憲民主黨也好，那同是農民與勞動者呵。他們被屠殺，但他們也要來屠殺赤軍的。這種內亂的本質，不過是伊里基扯着米留可夫資本家的短髮，米留可夫扯着伊里基的亂髮而已！這是你侮辱列甯的證據。馬克辛，你也不是馬克辛主義者，因為你曾自稱過：「我知我是一個蹩腳的馬克辛主義者」。你是不折不扣的「托匪」，你在「回憶列甯」中，一再爲托落斯基辯護，不，當倫敦黨大會時，你還恭維托氏，說：「我是你的崇拜者」。馬克辛，像你這樣的人，你還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地方呢？

旁邊的人，瞳目在思索着風暴是否到來，高爾基額頭的綉紋重疊起來，鬍子有些掀動，正當他用更烈的手段，報復他的敵人，說出：「你這日本帝國主義偵探內山完造的「朋友」，不，你這中華民族的漢……」時，有馳騁馬蹄的聲音，由後面傳來，安特別伊娃知道來人是誰，打一個信號給高爾基。老人感覺有一塊骨頭，阻着喉嚨，暫時失却了知覺！沈寂的空氣，驟來是用爲等待那至高無上的裁判者——騎馬奔馳前來的人！

本文係一九三七年登於「青年嚮導」